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刘禹锡《秋词》图为复旦校园实景

CONTENTS

WWW.FDMS.FUDAN.EDU.CN

第三期



08 要闻

2007 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举行

7 月 18 日，2007 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隆重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工商管理与企业成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先后在会上发言。李岚清指出，管理科学是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表示，上海将为管理创新提供沃土。



封面图片

策　划／刘海阳　摄　影／陈冬涛

统　筹／马晓楠　陆　艳

奥运的无限商机和有限时机

12 要闻

复旦大学复奥体育产业中心主任、中国奥组委副主席何慧娴从奥运营销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2008 北京奥运的无限商机和有限时机。





52 大视野

中国企业十年盘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盘点中国企业十年之路，并回答了“世界级企业标志到底是什么”、“中国企业路在何方”等问题。

管院要闻

李岚清 管理科学是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 06

习近平 上海将为管理创新提供沃土 10

成功体育赞助策略峰会在京举行 15

复旦 EMBA／MBA 举行联合毕业礼 16

让我们一起去书写历史 18

第七届国际创业论坛聚焦亚洲创业 19

教师节的礼物

胡建绩老师：走过生命的泥泞 22

师当若山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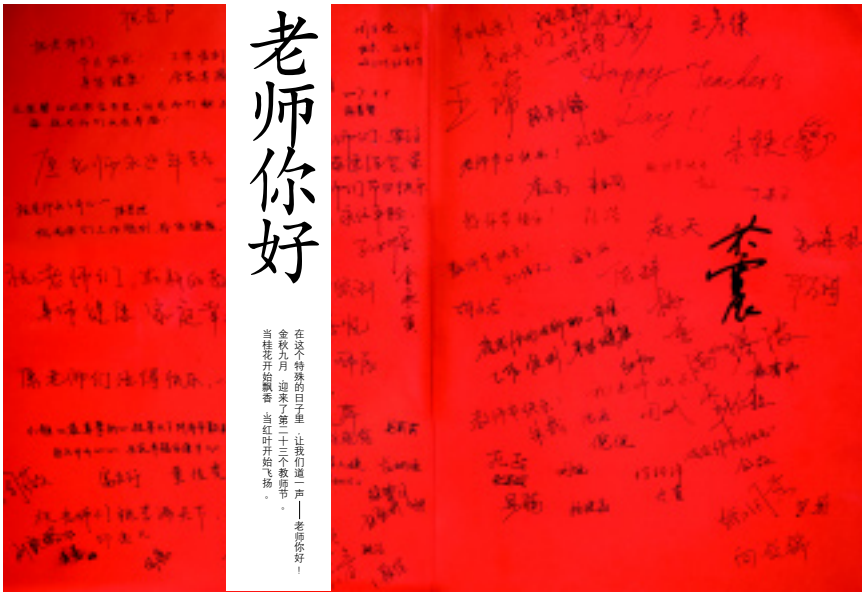
芮明杰老师：蝉联重点学科的背后 28

朱道立老师：物流事业的开拓者 31

苏勇老师：勤奋且高产的秘密 34

郑明老师：恬静优雅的“统计人生” 37

单纯的“问题男生”张诚老师 40



20 教师节的礼物

献给第23个教师节的礼物

当桂花开始飘香，当红叶开始飞扬，金秋九月如期而至，相伴而来的是一个神圣的节日——教师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八位优秀老师同一位华人学者一起，将如斯故事娓娓道来。言学术，话理想，谈笑人生。初秋的云淡风清中，摇曳着无数烛光。

86 文旦人复

中国的危机和出路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面临很大的危机。有的人认为这些是前进中的困难，我认为是根本性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92 生活方式

土耳其旅游笔记

此前的某一天，我突然觉得沉闷单调，于是拨通了Hudai的电话："My friend, I will visit you in August"。于是办签证，买机票，一轮匆忙后，踏上了从浦东转经迪拜飞往土耳其的航班。

天生乐天派裘理瑾老师 42
陆亚东教授：且行且大成 44
过去的教授 47

大视野

罗康瑞：10年后的上海 56
致胜营销全攻略 59

管理大讲堂

成功营销之五大法宝 62

管理实践区

国际品牌与本土化策略 65
中国企业跨国之路 68
从小骆驼到强骆驼 71
民营企业迈向卓越的突破 73
企业成功与商业模式创新 76
品牌服饰"例外"的加减法 79

专栏

宜家发展的风险和瓶颈 80
CFO的"边界"与"陷阱" 81

知识分子问卷

N个有趣的小问题 82

商学界

中国首批MBA亲善大使亮相 83

校友汇

胡炜：复旦管院给我智慧 84

记事本

N个活动 90

管院书局

《经济谈判》 96
《企业成长》 96

软实力

1908年，哈佛大学首创MBA，把管理教育引入一个新时代。

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尔最早提出“软实力”一词。“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得到世界普遍认同的重要方面。各国都在打造自己的软实力，这已成为国际竞争新领域。”

2007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率先指出，管理科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解决好中国的管理问题，要让中国人对世界范围内涉及自己的管理问题有话语权，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人自己。”

在管理教育备受重视的当下，有理由相信，管理科学将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从事管理教育的老师的努力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在这期院刊中，我们聚焦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八位优秀老师和一位世界知名华人教授，听他们言教学，话科研，求索管理教育的新突破。

在此期院刊里，我们记录了诸多管理者的声音，听他们总结实践，分享经验，探寻管理之道。

在本期院刊内，我们还特别刊登了陆雄文院长对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使命的阐释，“我们的使命即是，动员并集聚当今中国最优秀的研究与教育资源，基于中国商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背景，提炼能分享于世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管理经验与理论。”

……

让我们一起打造属于复旦、属于中国的“软实力”！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教育推广和发展中心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李岚清：管理科学是国家软

文／吴兴宇　图／陈冬涛

7月18日上午9点，2007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隆重开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会上发言时指出，管理科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培养出大批有很高学养和丰富经验的管理者，并花大力气建设高质量的管理教育体系。

李岚清首先回顾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最近20多年来，管理学在我国已经日益成为引起人们重视的学科，这和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快



实力重要组成部分

速发展有关，也和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都存在大量的涉及管理科学的问题。我长期在大型企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工作，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管理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涉及到我个人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我是新中国也是母校复旦大学培养的第一届管理学毕业生，同时也是最后一届。等到我毕业了，管理系也就没有了。管理学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走进中国人专业的视野，全面进入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是最近 20 多年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越来越离不开管理科学的支撑，社会管理、环境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对管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要取得持续的优势，这些都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科学的研究，提高管理水平。可以说需要管理学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管理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前，中国管理科学正迸发出空前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

李岚清强调，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共性，但是管理要获得成功则必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要真正解决好中国的管理问题，要让中国人对世界范围内涉及自己的管理问题有话语权和平等的参与权，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管理科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不断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要具备并不断提高解决各类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出大批有很高学养和丰富经验的管理者，要花大力气建设高质量的管理教育体系，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管理学队伍。李岚清说：“我在

退休以后给自己定了一条不干预政务的自律。但是作为一个老的共产党员和公民，我的退休生活就是八个字，健身健老，读书写作。受我们现在在职的各级领导同志关爱，我还是享清福了，但是也不能光讲清福，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于是我就想到我的专业和本行管理学。在我的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我决定将两本书的稿费捐赠给我的母校，做一点支持、鼓励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事情，并将捐款作为种子基金在2005年9月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基金会的建立得到了各界朋友的支持，我特别感谢上海市的支持，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感谢。基金会的宗旨在于奖励在中国管理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和工作者，推动管理学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最终推动中国管理学的长远发展，促进中国管理学人才的成长，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为了感谢母校的培养，希望复旦大学为全国管理学的发展承担一点责任。这个基金会就设在复旦大学，尽管它的名字叫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但它是面向全国的。我们设立了管理学基础贡献奖，每年评一次，聘请了世界上著名的专家学者，成立评奖委员会，成思危同志担任主席。我们还将每年举办一次管理学国际论坛，促进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鼓励管理创新，推动我国管理学长远发展，促进我国管理学人才的成长，提高我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李岚清最后表示，衷心地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激励中国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工作者投身管理、潜心研究、勇于实践，让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越办越好。“我衷心祝愿中国管理学的明天更加美好，也祝福大家的明天更加美好。”

2007 复旦管理学

文／郭　静　图／陈冬涛

7月18日上午9点，为期两天的2007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隆重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工商管理与企业成长”，由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主席龙永图主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先后在会上发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作主题演讲。

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是复旦大学定期举办的最重要、规格最高的管理学国际学术会议，是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进行年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评选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是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同志发起成立的。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第一天为企业家专场，第二天则开设专家研讨专场。企业家专场的主题为“塑造卓越的企业：最优秀企业管理的中国实践”，该专场设立两个分会场，分别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和副院长薛求知教授主持。上海实业集团董事长蔡来兴先生、均瑶集团首席执行官黄辉先生、百胜集团中国区总裁苏敬轼先生作为第一分会场的嘉宾，先



国际论坛隆重举行

后作了精彩演讲。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钱军先生、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柳先生和北电大中国区总裁吴振生先生则在第二分会场作了精彩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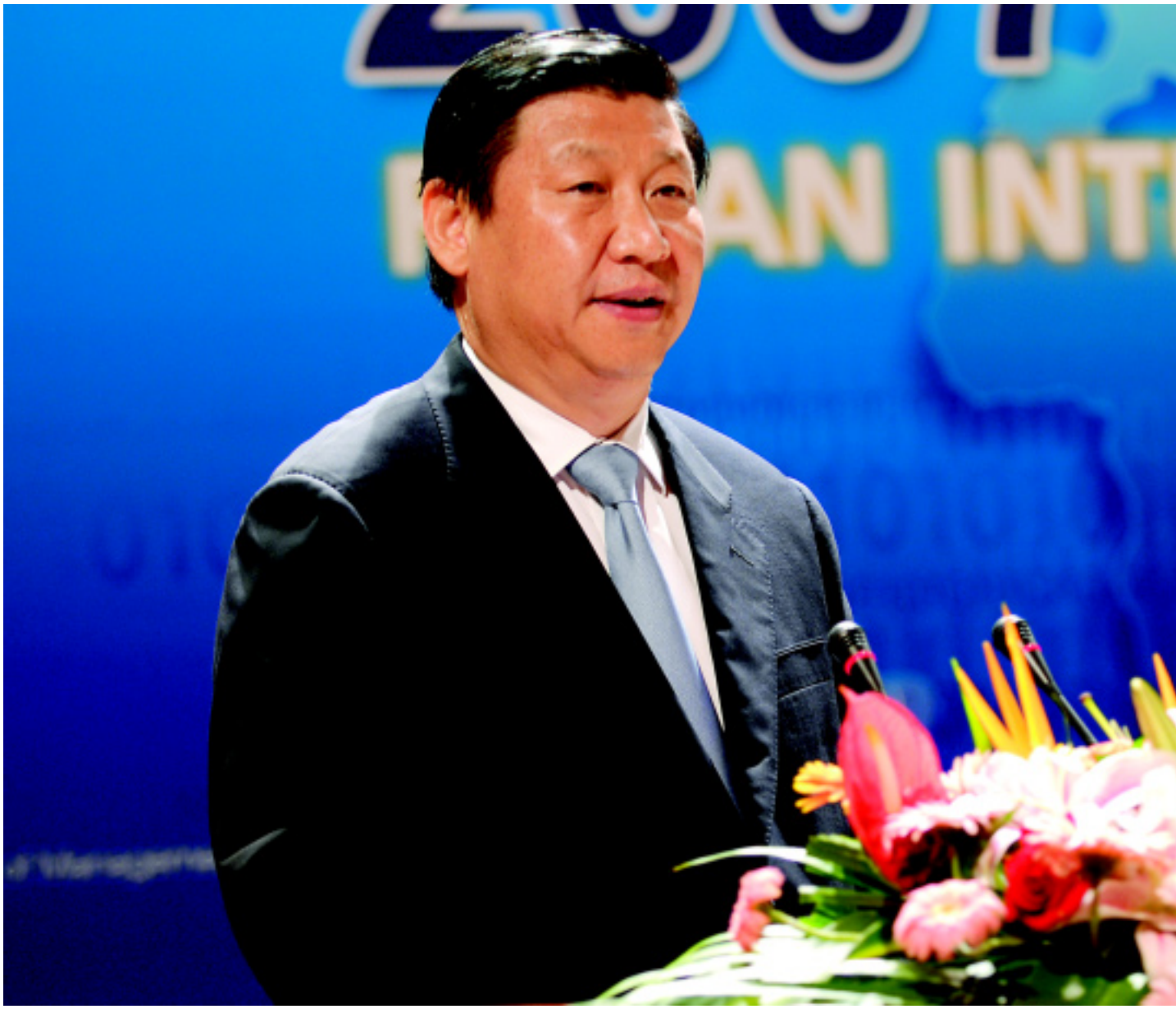
7月19日的“2007管理学国际论坛”的学术报告专场邀请了众多管理学界的重量级教授到场，海内外的管理精英济济一堂，就“管理理论发展与企业成长”为主题进行讨论交流。陆亚东教授、张春教授、范秀成教授、石勇教授、胡建强教授、谢贵枝教授、许士军教授、芮明杰教授、张维教授、伊志宏教授分别在两个分会场作了主题报告。

论坛最后还安排了“管理学发展和管理学科建设”的管理学专题研讨会，开设了“战略与国际商务”、“营销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与会计”等四个分场进行专题讨论。

当天，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李岚清会长出席了会议。在本次理事会上，评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丽华教授向理事会汇报了2007年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的评选情况。此次评选借鉴诺贝尔奖评选方式，以“提名与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最后由专家委员会从7名候选者中投票选举出3名获奖候选人，分别是浙江大学王重鸣教授、清华大学陈国青教授和南开大学李维安教授。理事会经过表决，同意了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名单。

会上，李岚清会长表示了对基金会上半年工作的肯定，并鼓励基金会各位同志继续努力工作，争取更大范围地扩大基金会的知名度和“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的影响力，为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切实的贡献。同时，李岚清会长还对基金会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习近平：上海将为管理创新

文／吴兴宇　图／陈冬涛

7月18日上午，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2007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发言时指出，上海必将为管理创新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

习进平首先对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尊敬的岚清同志、各位来宾同志们，很高兴有机会参加2007年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首先我代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李岚清同志的亲切关心下，在基金会各位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海



提供沃土

内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近年来不断发展提升，日益彰显活力，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管理学国际学术会议之一。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进行，现代管理学在中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运用和发展。今年的论坛邀请了来自海内外工商管理学界众多知名专家学者，还有国内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政界、商界、学界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工商管理和企业成长这个话题，为学术界和企业界交流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为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习近平接着指出，近年来，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建设正在踏踏实实、步步为营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上海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拥有一批像复旦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不断引进、传播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思想方法；得益于汇聚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些著名的大学、大企业而感到很骄傲，也为能举办像今天这样的高层国际论坛而感到很高兴。当前上海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努力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在继续开创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举办举世瞩目的2010年世博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习近平最后强调，展望未来，开放、和谐、充满活力的上海必将为包括管理创新在内的科学研究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魅力无限、充满商机的上海也必将为各类企业和有识之士提供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我们真诚地希望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秉承基金会的宗旨，不断加强理论探索，推动管理创新，为增强上海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们由衷地期盼各位专家学者关注上海，贡献智慧，共同演绎好这一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伟大梦想。同时我们热忱地欢迎工商界的各位朋友多来上海参加考察、投资兴业，共建、共享上海改革发展的成果。"我相信在大家的热情参与和积极努力下，这次论坛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预祝大家在上海期间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会议顺利。"

时间：8 月 14 日
地点：复旦大学复奥体育产业中心成功体育赞助策略峰会
演讲嘉宾：复奥体育产业中心主任、中国奥组委副主席何慧娴

奥运的无限商机和有限时机

文／王茹辛 编写

我发言主题是“奥运的无限商机和有限的时机”。这个题目比较大，我想仅从奥运营销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奥运营销的无限商机

在这里我不是笼统地说奥运会会给中国、给北京整个城市带来多么多么大的商机。关于这个问题在北京市政府召开的奥运经济市场推介会上就已经公布，2008 年北京奥运会将创造高达三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市场。据当时的副市长张茅透露，预计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直接跟奥运相关的需求将会超过 2800 亿元人民币；另据北京市测算，这一阶段的消费市场总额也将超过 1.5 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奥运大蛋糕等待切割，不得不引起全国、全球一大批企业的关注。如何来分享这块蛋糕？尤其是如何借助奥运营销来提升本企业、本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本企业本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热衷于体育产业或者越来越多认可体育营销的企业的极大关注。据了解，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通过体育营销开发资源的收入已经占整个体育产业总收入的 60% 到 70%，而国际奥委会通过体育营销开发资源收入所得已经占它总收入的 89%。

然而“无限的商机”并不直接等于“无限的财富”，作为体育资源的拥有者通过体育营销资源被开发得到了很大的收入，但是不等于作为体育赞助

商付出的很大投入就一定能够获得相应的成比例的产出，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体育营销、有效地实施体育营销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说，奥运会的无限商机是存在于奥运营销之中。

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奥运营销充满信心，那就是国际奥委会于1985年推出、1988年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开始正式实施的奥运会全球赞助商计划，即TOP计划，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功。至今已进入第六周期，20年来TOP计划的赞助费收入逐期增加。据悉，1984年还没推出这一计划时，企业赞助奥运的门槛最低不得少于400万美元，到了1997到2000年，该计划的11个成员赞助费平均4000万美元，从2001到2004年为第五期计划，每个成员的赞助费达到了5500万美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TOP成员平均赞助额已突破6000万美元。与此同时，赞助商们在奥运市场推广和营销方面的投入也一期比一期高，据说已经达到了1：5的比例，有的更高，如可口可乐公司在投入大量赞助费后，拿出9倍于赞助费的数目用于奥运市场开拓（即每1美元的赞助要配合9美元的推广营销）；可喜的是，大多数TOP成员相对稳定，2001—2004年TOP计划，共有11家全球赞助商。其中9家（可口可乐、柯达、松下、麦当劳、源讯、三星、VISA、斯沃琪、通用）续约北京奥运会，有的甚至于签到了2012年。这些成员在不断大幅度递增对奥运的赞助费和营销费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和产出，是不可能继续留在TOP计划内，不会不断地续约的，他们能够抓住奥运商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具备高水平、专业化的奥运营销能力。TOP成员有不少奥运营销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分析，但这里我只想举一个已摆在我们面前的很有说服力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联想集团成为奥运赞助商TOP成员后，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他们准确地把握时机，有效地实施奥运营销计划，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联想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陈绍鹏说，我们赞助奥运3年，联想的知名度（无提示的第一提及率）从62提高到68，美誉度从53提高到了62。据北京市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联想的品牌价值从2004年的307亿人民币提高到了2006年的607亿元。两年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4%。更有说服力的是，今年第一季度的营业额为39亿美元，同比增长13%，股东应占盈利为6700万美元，同比上升11.8倍。陈绍鹏说，我们不可能区别出其它工作方面对这个成绩贡献了多少，但是我们相信奥运的推广和营销是最主要的推动力。

三年前我对联想成为奥运全球合作伙伴能否成功曾持怀疑态度，但是，三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我认为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奥运赞助策略的把握，对奥运营销计划的有效实施。

赞助奥运不是买广告，不是去买曝光率，赞助奥运会只是获得了一个支持奥运会的特殊权益。这个权益实际上是对企业营销能力的考验。联想的奥运营销计划成功在抓住了奥运营销的本质、核心，那就是传播传统奥林匹克文化，发动更多人参与到奥林匹克中来支持奥运会。

奥运营销商机无限，但“无限的商机”并不直接等于“无限的财富”。

国际奥委会曾经在洛桑公布过一个调查，内容是人们对奥运五环标志的熟悉程度，调查是在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印度、巴西、牙买加、尼日利亚等普通人中间进行。结果是，有86%的人认为五环标志是全世界人民熟悉的，有82%的认为五环是代表全世界最大的运动会，有77%的人认为看到五环就会使人想起体育运动，还有74%的人认为五环是成功的标志。全球无论哪个品牌企业的Logo都不可能获得人们像对五环这样的认知度。但是当这个企业成为奥运的合作伙伴赞助商，并且以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真正参与到了奥林匹克的各项活动中时，它们的认知度也自然会得到提升。当奥林匹克的Logo被允许和赞助商的Logo一起使用时，赞助企业的名誉度和品牌地位也必将得到提升。而这样的权利和地位必将激励企业员工在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口号鼓舞下创造更好的产品来支持奥运、回报社会。而这时，赞助企业的产品，其市场占有率必然得到提高。三年来，联想集团所走过的路和所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他们所实施的奥运营销计划是成功的。从奥运千县行将奥运教育带到广大的偏远地区，到成功地为北京奥运会设计了火炬，在不断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组织参与一系列支持奥林匹克的活动中，也同时不断展示了联想超越创新的产品，一起奥运，一起联想，使人们在认识奥运的同时，也更多地知晓了联想。仅从联想眼前已取得的收获看，无疑联想已实

施的奥运营销方案，已经是一项能够实现双赢的奥运营销成功案例。

有效时机的冲刺效应

今天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359天，北京奥运会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每届奥运会市场开发越来越规范，给各级赞助商的权益、回报条件也越来越细化和量化。奥运商机无限，但时机有限。老牌的TOP计划赞助商往往采取捷足先登的办法充分把握奥运所赋予的有效时机，奥运营销启动早，冲刺力度大。2008奥运会赞助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一年开足马力冲刺是谁也不会放过的。但是冲刺效应的大小可以说是对奥运营销的一次考试，而且是一次同场大考。

在这场考试面前我个人认为被考者不仅仅是奥运赞助商，还有我们奥运资源的拥有者。

据悉，2008年奥运会市场开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可以说创造了又一个奥林匹克之最，筹措到了办一届奥运会来自组委会市场开发的最多资金。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海内外的50多家企业成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等，这些企业为北京奥运会运营带来巨大的赞助费是令整个奥林匹克大家庭都惊喜的。因为奥林匹克大家庭204个成员都是受益者。可是2008年奥运会市场开发所取得的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对于2008奥组委、对于中国奥委会来说究竟是喜是惊还是忧？我个人认为现在做出回答为时太早。现在作为奥运资源的拥有方（国际奥委会奥组委、中国奥委会、奥组委）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好地维护这些赞助商的权益，做好对赞助商的服务工作，真正帮助他们在巨大的投入之后，通过与奥运、与本企业、本品牌、本产品紧密结合的市场营销中获取目前的和未来的最大产出。我们要全力帮助他们在最后一年里考试过关、冲刺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去年倒计时两周年的时候，在庆祝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取得一系列成绩时，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在研究奥运经济和奥运商机时，已经超前关注“后奥运时代”，开展了“后奥运风险的研究”。



经济学家们认为，所谓的“后奥运风险”，一个是指后奥运可能的“低谷效应”——在奥运筹备期内，由于奥运会场馆建设和为满足奥运会需求而进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带来投资的大量增加。但是等到奥运会结束以后，这方面的投资需求会出现大幅的下降。这种由投资需求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现象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奥运经济的“低谷效应”。二是指奥运场馆赛后利用上可能的风险——奥运会期间需要大量比赛场馆，奥运会结束之后，如何避免场馆闲置就成各主办城市面临的难题，耗资巨大的体育场馆仅养护费用就会成为举办城市的沉重负担。

我个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这么多企业高门槛进入、巨额赞助奥运会，如果最终大多数企业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产出，这也是一种“低谷效应”，也势必在后“奥运时代”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必将使企业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热情受到打击，使刚刚兴起的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受阻，毕竟在这方面是有过先例的。据悉，在赞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200多家企业中，只有25%的企业得到了回报。

我们提前研究“后奥运风险”的目的是为了规避风险。重视有效时机的冲刺效应，对赞助商来说至关重要。

赞助体育明星，请体育明星做形象代言人，这是体育营销的重要手段。体育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产生轰动效应。尤其是在奥运会上体育明星的表现更具有穿透力。所以许多赞助商在出资赞助奥运会之后还要出资和优秀运动员、运动队签约，支持他们在奥运会上创造好成绩，往往能够在奥运聚焦的时刻实现冲刺效应。当然这需要非常智慧、非常敏锐的营销手段配合。举一个虽然不是在奥运会上，但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去年刘翔破世界纪录时，当他在洛桑以12秒88的成绩创造新的110米栏世界纪录后，第二天国内的电视媒体上出现了两条新的广告，一条就是以电子记分的形式把12秒88的数字定格锁定在电视屏幕上，然后出现耐克祝贺刘翔的一种标牌广告。另一条是Visa公司在24小时内紧急更换了已经占有的广告时段中他们的广告语，同样锁定在12秒88刘翔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将广告语改为"祝贺刘翔刷新梦想"，然后出现刷Visa卡的图象。可以说这两条广告甚至起到了吸引眼球、聚焦新闻的强势作用。当然这两家公司都是赞助刘翔、与他签过约的公司。

然而不量力而行，一哄而起都去和体育明星签约的模式也不值得提倡。因为第一，大牌明星身价太高，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承担的。第二，签约太多，效果会降低。本届奥运会一些TOP成员已经把赞助目标投向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些潜优势项目，如赛艇队、女子曲棍球队等，鼓励他们团结拼搏、实现突破。还有一些企业将赞助投向一些年轻的希望之星，鼓励他们脱颖而出。

奥运会竞争的激烈性、不可预测性为赞助商搭建了广阔平台。赞助商们在支持运动员创造好成绩的同时，应勿忘奥运重在参与，不要放弃奥运与全民健身通行的营销平台。奥运营销有条件、有可能地吸引媒介的广泛报道，但也要合理地安排好冲刺阶段的广告投放，以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国际奥委会规定，奥运赞助商在购买了奥运电视版权的媒体上以及各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拥有的媒体上，具有优先刊登广告的权利。各级奥运赞助商，在高度重视奥运营销冲刺效应的同时，千万要制订好后奥运时期的营销计划，充分发挥奥运的延伸效应。

成功体育赞助策略峰会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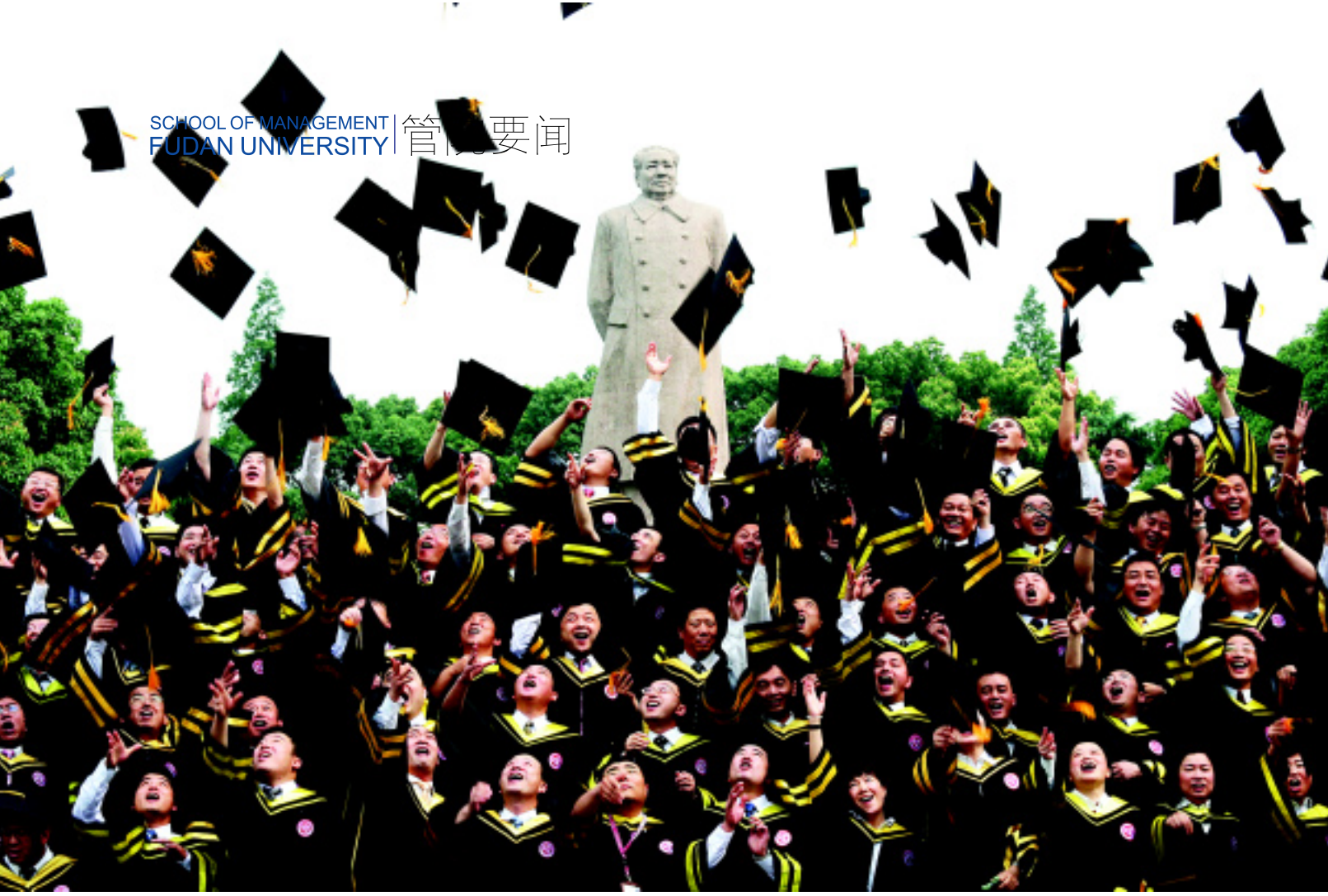
文／吴兴宇

2007年8月14日、15日，"成功体育赞助策略"会议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隆重拉开序幕。会议主席、欧洲体育集团执行总监Olivier FISCH为大会致开幕词，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复奥体育产业中心主任何慧娴女士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无限的商机，有限的时机》的主题报告。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复奥体育产业中心与全球最大咨询公司INFORMA集团旗下艾毕思公司联合主办。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在成功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之时，中国已经成为体育赛事、体育营销和体育赞助关注的焦点。本次会议立足于此，旨在集中行业经验进行分析和讨论，解决体育营销中的关键问题。

出席本次会议的演讲嘉宾还有百事中国市场总监Mark Clarence、耐克中国体育市场部总监李彤、恒源祥集团副总经理陈忠伟、西门子中国副总裁史明佳、索尼爱立信中国副总裁宁述勇、联想中国奥运赞助项目总监谢龙、通用电气工业与消费品亚太区首席市场官王丽丽、腾讯网络营销服务与企业品牌执行副总裁刘胜义、盈方体育传媒广告总裁王应权、汉威士体育总经理杨善政等商业领袖和体育界精英。

谈及会议的缘起，何慧娴女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捷增长及其成功地申办2008年奥运会，社会各界对体育及体育营销赞助产生强烈反响。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体育产生兴趣，中国运动员接连取得骄人成绩，品牌和产权在中国受到日益关注，赛事主办方和体育赞助商发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机会。企业如何有效地借助体育赛事，向市场推广自己的品牌，以期达到品牌价值的最优化和体育营销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国内外企业战略发展的一次重大契机和热点议题。"



荣耀与共 再上征程

——2007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文／蔡 巧

2007年7月15日，朱奕华起得特别早，不到六点半就来到了复旦校园。对于她而言，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历时两年半的复旦大学IMBA学习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面对今天的毕业典礼，她激动不已。和她一样兴奋的人还有很多，800多名复旦大学MBA项目、复旦大学IMBA项目、复旦大学EMBA项目、复旦大学MPAcc项目、复旦大学－BI挪威管理学院MBA项目，以及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的英才都汇聚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和一直支持他们的家人、老师们共同见证了“2007年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联合毕业典礼”。

洋溢着的灿烂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等领导和30余位管院教师莅临了本次毕业典礼，为即将踏上新征程的复旦学子饯行。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孙一民博士隆重宣布了本次毕业典礼的开始。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秦绍德教授依次为353名MBA毕业生、89名IMBA、177名EMBA、61名MPAcc学员以及111名复旦大学—BI（挪威）管理学院MBA和51名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颁发了学位证书和学习证书，并郑重宣布同意毕业。此时的礼堂顿时化为一片喜悦的海洋，无数的学位帽被高高抛起，其下洋溢着复旦学子的灿烂笑脸。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说，今天的复旦学子很有幸地站在了两段历史的交汇点上，一段是中国从落后走向文明的发展史，一段是要靠中国英才们去书写的未来。他指出，在未来的15年到25年内，中国经济会

继续发展，其中的商机无限。对于即将开拓前程的毕业生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陆院长语重深长地提出了对所有管理学院毕业生的希望，他说，复旦管理学院的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的商学院，而这样的目标是否能够完成则完全依靠所有的毕业生来体现。复旦的学子肩负着自身的使命、复旦的使命、中国的使命，此次毕业典礼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复旦将是这段征程的坚强后盾。

说不尽的感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自1991年开展MBA教育以来，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出色成绩，创造了深入人心、广受赞誉的复旦MBA品牌。1996年，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联合创办复旦国际MBA项目，致力于培养既具全球经济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的国际化管理精英的国际化特色吸引了大批学子精英。2002年8月，复旦大学成为国内首批获准开设EMBA学位教育的院校，截至2007年6月，已顺利完成十期招生工作。同时，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还开展了会计硕士项目，它以科学严谨的项目管理为支撑、以企业合作为依托、以培养高素质的财务会计人员为目标，广受学生和企业的好评。今天，这些来自于管理学院各个项目的精英们，依次从秦绍德书记的手中接过印有复旦校徽的毕业证书，除了兴奋之外，还有无尽的感谢。

看着手中毕业证书，朱奕华既激动又感叹，"终于毕业了，两年半来的学习很辛苦，平时要上班，周末要上课，需要看的书很多，需要做的课题也很多。可是就在其中，我得到了更多。"她说，在两年半的学习中，复旦的老师教会了她许多知识，让她无论在理论或是实践上都收获良多。在复旦的学习中，她深切地体会到了团队意识的重要性，管理学院的课程教会了她如何将1+1大于2。同时，通过团队活动，她接触到了各大公司的精英分子，对各个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这是一次成功的投资！收益颇丰。"她这样评价自己的学习生涯，"如果再来一次，我会选择全日制班，用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去学习，毕竟复旦拥有了太多的资源，仅仅是两年半的时间还远远不够。"

> "这两年来真是足以享用终生，复旦将是我们永远的加油站！"

MBA学生代表段绍斌代表所有毕业生表示了感激之情。他说，复旦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大师风范，使他更加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也使他学习到了如何把握未来。他说，是复旦将自己从普通的石头雕琢成了光洁的美玉，复旦的恩情将铭记于心。

生命中的荣耀

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在对本届毕业生的寄语中提到，"各位同学们，请牢记，我们拥有一个永远的名字——复旦人：你们的未来，与复旦荣辱与共。"对此，复旦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复旦人的使命感。MBA学生代表段绍斌在发言中说道，这一段学习经历不仅是宝贵的记忆，更是生命中的荣耀。他希望





在以后能够为复旦的发展做出贡献，为复旦管理学院增添光彩。

EMBA的学生代表詹定国也表达了自己对复旦的感激之情，"这两年真是足以享用终生，复旦将是我们永远的加油站！"他说："所有复旦学子的未来都是与复旦紧密相连的，我们坚信，今天我们以复旦为荣，明天复旦以我们为傲。"正如毕业典礼上的誓言，"兴我邦国，爱吾复旦，荣耀既始，再上征程"，这代表了所有2007年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会计硕士毕业生的心声。

让我们一起去书写历史

——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在2007届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尊敬的秦书记、尊敬的毕业生们、尊敬的毕业生家长和家属们、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上午好！

今天，复旦大学2007届MBA、EMBA、MPAcc项目的八百多名毕业生共聚相辉堂，满怀喜悦和豪情。在此时此刻，我谨代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体毕业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向毕业生的家属们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感谢！

毕业生朋友们，今天，你们站在了两段历史的交汇点上。一段历史，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探索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闭锁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先进的征程中，曲折徘徊、艰苦卓绝，终于开拓出一条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路径。另一段历史，叫做未来。这是一段刚刚开始，留待我们、更是你们去书写的历史。这将是中国在世界屹立、承担更大责任的历史。经济学家预测，大约再过不长的时间，悲观一点是二十五年，乐观一点是十五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这其中包含太过丰富、太可令人想象的信息。

首先这将不是一段一帆风顺的历史，国家面对挑战，企业面对挑战；但同时，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市场在不断扩大，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人群的差异造就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城市有城市的商机，农村有农村的商机，穷人有穷人的商机，富人有富人的商机，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还要拓展国际市场，可谓未来中国商机无限。

毕业生朋友们，站在这一历史时刻，我要问：你们准备好了吗？一年多前，我也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是今天为大家授予学位的秦绍德书记问我，你对管理学院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发展有何打算？二是美国精英商业教育协会，即AACSB的主席，也是UCLA商学院的院长Judy Qlian问我，你们要申请AACSB认证，我首先要问你们学院的使命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目前，复旦大学正朝着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的目标前进，复旦管理学院也必然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我的前任郑祖康教授在2000年末上任时设定了一个三十年的目标，那现在还剩下二十三年的时间。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目标呢？我们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回答只有一个，即我们有使命。我们的使命即是，动员并集聚当今中国最优秀的研究与教育资源，基于中国商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背景，提炼能分享于世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管理经验与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出大师，出基于中国管理思想研究成果的世界级大师；同时我们要为中国经济腾飞培养既有全球视野又对中国经济有深刻见解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包括今天在座的新毕业生们，要能取代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学生成为世界级企业的领导者。这是历史赋予复旦管理学院的使命，这是国家赋予复旦管理学院的使命。因此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综合实力与能力，包括硬件、软件、有形、无形各个方面。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这是一个长期的建设目标，因此我们不浮躁，不功利。这一使命靠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来承负，却靠我们的毕业生去最后实现，你们的未来成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评判。

复旦大学MBA项目以塑造“青年精英，未来领袖”为己任，EMBA项目以培养“将帅之才”为宗旨，MPAcc用“会计天下”做座右铭。毕业生朋友们，你们是否准备好去成为统领天下的将帅、领导社会的精英？历史传承到你们手中，历史靠你们去书写，历史靠你们去成就。你们能否抓住这历史的机遇，就要看你们能否承负这历史的使命。我认为使命决定境界，境界决定你事业成就的高度，决定你人生阅历的厚度。你们承负着对自己的使命，对企业的使命，也承负着对复旦的使命，更承负着推动中国复兴和崛起的使命，而所有这些使命都在这一历史时刻交织在一起。

毕业生朋友们，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将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历史是对你们自身价值的诠释与体现，也是对复旦精神的传承与光大！复旦所孕育的深厚人文底蕴将是你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能量。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你们举办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的英文是Commencement，它又是开始的意思，今天的典礼就是各位荣耀再上征程的起点，复旦将是你们这一荣耀征程的坚强后盾。我们将关注你们，支持你们去完成这伟大历史所交付你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将为你们骄傲！祝福大家！谢谢！

第七届国际创业论坛聚焦亚洲

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创业活动引起了全球关注，第七届国际创业论坛围绕“亚洲创业：全球创业和创新环境中亚洲的新机遇”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文／吴兴宇

8月30日，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ESSEX）创业与商业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创业论坛（IEF）在复旦光华楼隆重拉开序幕。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致开幕词，英国Essex大学创业与商业学院院长Jay Mitra教授对国际创业论坛的整体情况作了介绍。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力支持。

当前，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创业活动引起了全球关注。第七届国际创业论坛即立足于此，在“亚洲创业：全球创业和创新环境中亚洲的新机遇”主题下展开具体讨论。

会议受到国内外创业界研究学者、创业者和政府组织的广泛重视，共有近百名国内外学者出席会议。其中国外嘉宾60余名，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印度、拉脱维亚等发展中国家。国内嘉宾包括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30多所大专院校的60余名学者。

经合组织（OECD）对本次国际创业论坛上海会议寄予厚望，派出了以秘书长Pier Carlo Padoan为首的16人代表团。

本次会议为期3天，分为4个板块。除了“国际创业论坛”外，还包括“博士生论坛”、“国际中小企业合作与交流研讨会”、“国际ICT与亚洲地区企业衔接与交流研讨会”等板块，着重关注亚洲创业的重要作用、亚洲的新商业和新增长机会，以及亚洲创业企业与世界其它地区创业企业之间的国际合作、技术和知识共享等方面内容。



会议期间，经合组织代表团还访问了复旦大学、上海高科技园区、上海高科技企业，加深了对上海和中国经济的理解，为促进OECD与上海乃至中国的合作、进一步评价和建立亚洲创业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

与会人员表示，这次盛会为创业研究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创业实践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让他们认识到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日益增长的创意、资源和知识流动，从而推进新的创业机会的产生，并能促进建立在国际合作、网络和联盟基础上的新增长机会，以及增加跨国界新型组织出现的可能性。

据了解，国际创业论坛是由英国Essex大学商学院联合英国以及国际上其他大学共同建立的、旨在为国际创业研究与实践提供合作交流平台的一个制度化论坛，是全球创业研究和实践的盛会，具有很高的国际影响。论坛自2000年在英国伯明翰成立以来，每年举办一次，每次会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题，组织相关人士进行演讲以及讨论，与会者主要包括创业研究学者、创业实践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

第七届国际创业论坛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也使中国成为论坛成立以来，惟一一个举办了两次会议的国家。2002年，第二届国际创业论坛于北京举行。这和中国浓厚的创业与创新氛围是分不开的。







当桂花开始飘香

当桂花开始飘香，当红叶开始飞扬，金秋九月，如期而至的是一个神圣的节日——教师节。此时，空气里氤氲着的，不单只是沁人的花香，还飘荡着微微的声音。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八位优秀老师和作客管院的一位世界知名华人教授一起，将如斯故事娓娓道来。言学术，话理想，谈笑人生。于是，初秋的云淡风清中，摇曳着无数烛光。

他们说，生命如此泥泞，过去的生命也是在坎坷中前行。

他们说，作育英才不仅是一种责任，还是一种风范。



他们说，打造一个优秀的学科并非一日之力，成功之后还需要日复一日的苦心经营。

他们说，做学者是一辈子的事业，走进去了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说，开拓一个新的学科需要的不仅是智慧和勇气，还需要用之不竭的坚韧和执著。

他们说，忙碌的治学生活也可以恬静优雅。

他们说，更加广阔的世界学术舞台意味着更多，是机遇，是挑战，也是磨难。

他们说，年轻的学者正在努力着，用青春的年华滋养着同样青春的你我……

胡建绩老师：走过生命的泥泞

“文革”伊始，胡老师高中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之后，为了响应“上山下乡”的口号，又被重新分配到崇明的农场，一呆就是3年。

文／刘海阳 蔡 巧 图／陈冬涛

可以这样说，我院教授评议会主席——胡建绩老师的故事意味着很多。一段民族苦难的经历，一代人拼搏的足迹，教授们的奋斗经历。酸甜苦辣，都铭刻在其人生旅途中。如今，泥泞尽去，当我们重新聆听这样的历史，仍有无数的感动涌上心头。



农村磨炼

胡建绩老师的故乡安徽绩溪是片灵气之地，孕育了太多的人杰，胡锦涛主席便是胡老师的老乡。虽说从小长在上海，可安徽人的勤劳和质朴深深地影响了胡建绩老师。同时，传统教育赋予了他学习思考的方法，为以后他的产业经济学与东方管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6年，“文革”伊始，胡老师恰好高中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工厂的热处理车间工作，上了11个月班。就在这11个月里，他自学了高等数学与高等物理的部分知识。之后，为了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的口号，又被重新分配到崇明的农场，一呆就是3年。本来，他是被分配到条件相对较好的一大队蔬菜班，可三天后他就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五七连队”去工作。“五七连队”是一个新建的连队，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房屋，所以他们每晚上只能睡在猪棚里。那里的房子都是用芦苇编织而成的，胡老师主要负责最难编的屋墙的尖角部分。“割完芦苇剩下的桩子很锋利，像大刀一样，所以割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有一次，我不小心被芦苇桩子穿破了脚底，好久都走不了路。”艰苦的还不止这些，当时的他们都是席地而卧，地面十分潮湿，许多人都因此得了风湿，他幸亏有在朝鲜当兵的堂哥送了一床帆布席子和一双尖头皮鞋才没有落下一身毛病。胡建绩老师因表现出色，很快地被任命为四排（后勤排）排长，分管着炊事、蔬菜、绿化、饲养与卫生等班。仅炊事班就要为全连做饭，一锅饭有六、七十斤，常常要把一袋袋200斤重的大

米从大路背到食堂仓库，要为一两百人做饭，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就必须起床烧饭或买菜，农忙时一天十八、九小时的工作时间，使他学会了稍微有一点空就打个小盹的习惯。"现在我的身体里面有很准时的生理闹钟，需要在几点醒来，不用闹钟，我自然就会醒过来。这



都是当时锻炼出来的。"

面对这些苦难，胡老师仍是笑得自在，不仅是因为早已过去，更多的来自于对艰辛的坦然。"最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敢于锻炼自己，要积极积累，抓住机会。我知道，机会总会来的，机会总是等待那些有准备之人。"是的，他也这样做了。胡建绩老师在市重点中学读高中时期就是班上的佼佼者，担任班主席，数学成绩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所以，在农村时，能够左手、右手一起打算盘的他为连队培训出了会计与出纳。有空的时候，他就呆在寝室里面看书，三年下来，他通读了3卷《资本论》，选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从而埋下了对经济管理的热情。农村的夏天，蚊子特别多，而他又是特别讨蚊子"喜欢"的人，所以每天晚上，当别人在外面乘凉的时候，他只能闷在热烘烘的帐子里面看书。

对于那场群体狂热的下乡运动，最初的他也投入了最大的热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慢慢地看到了其中的问题。不过，他没有颓废沮丧，他知道：许多宏观的东西靠自己的一时之力决不能改变，所以，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他就是以这种"徽骆驼"的热情继续着农场的生活。对他而言，这是一次蛰伏，是一次对人生、对社会的最深层次的体验。

初为人师

1971年，上海市开始从知青中招聘老师，而早已做好了准备的他理所当然地被推荐成为了老师。经过9个月的师大培训，1972年，胡建绩成为了上海市定西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然而由于师资缺乏，他曾教授了数学、政治、地理等科目，用他自己的话说，"学校缺什么科目的老师，我就去顶上"。在这段教学生涯中，他渐渐地培养了自己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爱好，而且还提出了在当时可以算作石破天惊的教育理念：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老师不能以自己的好恶去衡量学生；只有糟糕的老师，没有不可教育的学生。而这个观念也伴随着他，一直到现在。当时的他，除了每天2节的教学工作，还担任了学校的多个行政职位——学校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党支部委员等。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经验中，他逐渐体会到教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教学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生产形式，它是一种生产劳动者的方式。而这也成为他以后研究的主体。

也正在这段教学的过程中，优秀的他获得另外一个机会。作为中学管理班子的一员，他常常需要到区里面培训。一次培训中，他发表了两个很有突破性的观点：一是不能拿领导的一字一句来代表一个体系，二是苏联的发达与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宣传霸权主义。这次学习体会引起了当时长宁区宣传部的几位老领导的注意，便向学校把他要到了自己的麾下。胡老师从而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从政生涯，一直到1977年参加高考后的入学。

这段经历又是一次很大的锻炼，他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都在其中得到了莫大的提高。不同于"文革"前期的狂热情绪，他学会了独立思考社会问题，学会了时刻恪守自己的原则，也正是在这不长的仕途中，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和适合教学与科研工作，所以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前途光明的仕途，在即将而立之年选择了去上大学。

求学征程

1977年，当胡建绩老师还在农村完成一年一次的干部劳动锻炼任务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几乎没有经过思考，他决定参加考试。政治的风风雨雨让他觉得学习知识重要性，一直以来对知识的热爱激励着他向学术的方向迈进。本来，他曾打算报考复旦大学数学系，以圆小时候之梦。但当时的老领导还希望他在毕业以后回去工作，所以坚决要求他报考文科。已有《资本论》等书本熏陶，在心中也暗

暗萌生出了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因此，他选择了复旦大学经济系。有意思的是，他在填报志愿时只填了一个志愿：复旦大学，并注明不服从校间调配。如果不是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自信，这样的勇气谈何而来？在仅仅复习一个星期以后，他进入了高考考场，随后没有悬念地得到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



进入复旦后的，或许是十一年中对知识的渴望，大家都自我加压，所有的同学都拼了命地去学习。每天晚上十时半熄灯后，有的挤到电话间里面去看书，有的在路灯下背单词、有的在帐子里听磁带。往往第二天六时左右又起来用功了。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对时间的珍惜是现在的学生所不能理解的。

如此自我加压的四年求学后，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毕业时，摆在他面前的有四个机会：一是留校任教；二是回长宁区宣传部工作，作为种子培养；三是去社科院给时任院长的老领导当秘书；四是进入上海市机关局工作。每一条道路都是霞光万丈，他也犹豫了。“当时，我的辅导员十分惊讶，从来没有面对留校的机会还说要考虑的人。”

经过衡量以后，他还是放弃了诱人的仕途，留在了复旦大学管理系。那时的管理学院尚未成立，整个管理系只有二三十个人，如今这些老师大多已经退休。他曾向副系主任要求，自己年纪不小了，希望不担任系里面的行政工作，把精力集中在做学术研究上。可在留校半年后，由于市里把干部班放在了复旦管理系，以前拥有丰富干部培训经验的他进入了管理学院管理层，开始了学术研究、学生工作两头挑的历程。他的努力很快得到了认可，在复旦大学第一届教师节上，他被评选为校级先进教师，当年整个复旦大学里获此殊荣的老师仅十余人，年轻教师更是只有两人。此后，他历任干部专修班指导员、班主任，党总支委员、教研室主任、常委副系主任、院长助理等职，并多次获得先进称号。

坚持发展

胡老师把自己的研究定为“研究发展”：价值发展、产业发展、企业发展、人的发展。不断学习、不断发展，也成了他的动力与座佑铭。

如今的他，除了继续学术研究外，还在总结着自己的教学生涯。除此以外，他仍然坚持不断学习。他常常与学生打成一片，在年轻人的身上去学习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仅是MBA、EMBA学生值得学习，更要向本科生与研究生学习，他们有朝气，是中国的未来。”同时，他还喜欢接触新事物，BBS、MSN、Blog等都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他正在创建与完善自己的网站，可以说他比很多年轻人都新潮。另外，他深知学习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的开放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业余时间他所看的书十分广泛，《圣经》、《古兰经》、《时间简史》、物理学方面、考古学方面的书籍等等，都是他的兴趣所在。

不要浮躁是他对于自己生活的总结，也是对于年轻学者和学生的要求。人有五商：情商、智商、技商、财商、谋商，而现在的有些学生缺乏谋商，技商较差，急于求成、不善积累。面对繁华的经济世界，要固守寂寞真的很难。“有些硕士生过量实习，从而把实习变成了打工，把稀缺的学习的时间都耗在包装求职的敲门砖上了”。胡老师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世界上最稀缺的是时间，所谓把握人生就是合理地用好一生的时间，提高时间的投入产出，在适当的时候完成适当的任务。”

闲暇时候，胡老师喜欢下围棋，曾经接受过半年的专门训练，曾进入过上海五区围棋大赛的复赛。另外，集邮也是他的兴趣之一，在恢复高考后复旦第一届集邮大赛上，他拿到了大奖。另外，看书读报也是他生活的乐趣，他说看书是一门艺术，从看书效率与休闲角度讲，什么时候看什么书，怎样看，都很有技巧。胡老师的故事很多，据说每一段经历都能写一本小说。走过了生命的泥泞，如今的他除了故事，还有说故事人的淡然。



师当若山

“把比较深的东西讲清楚很难，把这些知识讲得深入浅出更难，而在深入浅出中道出其本质则是难上加难。”　　——李若山老师

文／蔡　巧　图／陈冬涛

作为复旦大学极负盛名的老师之一，李若山老师坚决不同意自己是名师。他说自己只能算个教书匠。小小的幽默，彰显出了他的智慧和谦逊。子曰：仁者乐水，智者乐山。李若山老师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如山般巍峨挺拔，他用自己的多年的教学生命讲述了身为老师的责任和意义。

何为人师的思考

从教十几年来，李若山老师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何为人师？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作育英才的教师，首先应有的是对于此项工作的热爱。在教学生涯中了领略到的成就感、事业心，是他在教育道路前行中的坚强后盾。“人是有感情，有喜怒哀乐的。我们要传道授业解惑，与学生的交流完全不同于人与电脑的沟通，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不同的交流方式。”他如是说着因材施教的道理。因为，他也曾经是个学生，上学

时常常遇到一些曲折艰深的知识点，老师也很难把这些东西讲明白。“把比较深的东西讲清楚很难，把这些知识讲得深入浅出更难，而在深入浅出中道出其本质则是难上加难。”虽然很难，可这确是他多年的奋斗目标。

作为管理学的老师，他深知管理学极强的实践性，如何把实践中提炼的精华重新送回同学们的脑海中，的确不是易事。“实践性的学问必须要不断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更新知识，然后用最为同学们接受的方式传送。”具体而言，李老师指出了几点：一是传输方式上要多样，不能强行灌输；二是传输的内容要有新意，要具有时代感；三是教学过程中必须有幽默和诙谐。李老师无疑是以幽默铸成的，在他看来，幽默是饱含智慧的，是把本身枯燥艰深的知识进行深刻地挖掘的结果。他曾对学生这样表述“会计”这一职业，“我们从事会计十分辛苦，风险很大，当会计也就是作两院院士。做得好，我们就得累得进医院；做得不好，我们就有可能进法院。”就这样，他在轻松的幽默中将会计的意义表达清楚，还深入学生的内心。

“做老师最大的忌讳是拖堂。”这是李老师的结论。“如果你不能准时下课，估计学生恨死你的心都有。”教学是有双方面的，传授知识必须首先考虑对象的可接受性。所以，李老师认为，与其在下课后拖堂，不如在上课后五分钟内争取人心，尤其是在第一次上课的开始五分钟。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在每堂课的前五分钟让学生笑上三次，进而很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另外，与学生在课堂上互动也是李老师的不可或缺的法宝。“我在上课前会查一下所有的学生（主要是MBA、EMBA）的背景，上课时我会问哪些人当过会计，于是课堂上很多人举起了手，然后我就会拿一道看上去很简单实际很难的题问他们，这些学生于是很快给出了答案，但大都是错的。等我在讲这些知识的时候，他们也就特别的注意。”除了这些互动以外，李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进行角色模拟，例如现场模拟董事会，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彼此的交流与沟通。

“幽默是件困难的事情”。李老师也并非一个骨子里浸透着幽默的人，更多的幽默则是来自生活的积累。

来之不易的幽默

“幽默是件困难的事情”。李老师也并非一个骨子里浸透着幽默的人，更多的幽默则是来自生活的积累。虽然他是个大忙人，可每天总是会花时间上网浏览新闻，并且可以收集可以作为幽默的原材料的资料。“这两天，我看到了一篇讲企业盘点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假设，说如果企业养王八，那应当如何盘点？这是个很有趣的假设，王八的数量如何盘点，王八的身份如何确立，王八蛋如何设定，等等。我已经把它记了下来，以后上课会用到它。”同时，李老师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幽默数据库，讲给学生听了效果不好的材料也就果断放弃了。

李老师的幽默并不仅仅是语言。“可能很多老师都没有注意到，人的精神耐力是有限的，用同样的腔调、同样的表情和同样的姿势是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的。”所以，李老师在课堂上，全身上下都不歇着。他说，上课一定要手舞足蹈，一定要夸张，要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我讲某个企业的仓库很大，如果我说了一下仓库的尺寸，估计大伙儿都会没有反应。但如果我说，这个仓库有我们教室的四倍大，那么所有的学生都会有兴趣地研究教室的大小，然后听我讲下去。”他在课上，尤其喜欢模仿别人讲话，并不断变化语境。

“每一次课都是一场戏，都是一个舞台。”早在青年时代，李老师就与舞

台结下缘分。上个世纪70年代，他随上海知青大军来到江西农村，由于拉得一手好风琴，很快被招入县文工团，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演员。万万没有想到，那段艰苦的岁月为他后来的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理念和经验。“演出讲究节奏的把握，情节的跌宕起伏，要引人入胜。这和课堂多么相似！我的舞台经历使我善于观察受众的反应，用最佳方式与学生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

而课堂幽默的动因则是源于教学的深入。李老师回忆到，自己第一次上课时，四十五分钟的课程，自己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就用来把书本念了一遍。但到了第二次课时，无意中的一个玩笑让课堂活跃了许多，他便慢慢悟得了玄机。再到第三堂课时，课堂上已是全场掌声。于是，他把幽默一直坚持了下来。

休闲是一种奢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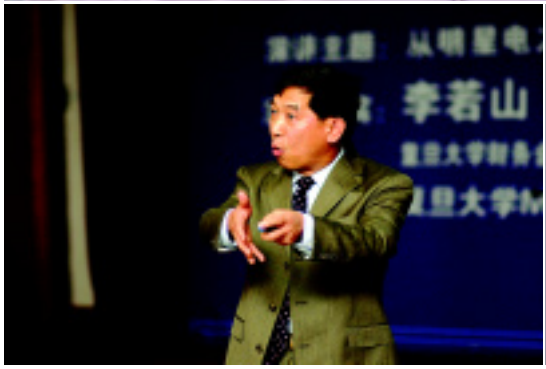
在李老师的生活中，幽默并不多。“幽默是有场合的，在追悼会上就没有办法幽默。”他坦言，自己在生活中并不幽默，因为压力大，休闲时间几乎没有，所以笑声就只能留在讲台上。

他每天一定会上新浪网，为课程准备新的素材，一有新的大事就马上与课程相结合。时间对于他而言，弥足珍贵。“我多是在候机室里上网、找资料，因为候机常常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有时在飞机上看到了不错的新闻，也会带着回家。”

至于生活中的休闲，他说：“没有休闲，被采访就算是休闲了。”如今的他，已经忙得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了，休闲或许真是一种奢侈。

采访一结束，他就匆匆地赶往了机场，宁波的一家上市公司正等着他前去作内部审查。看着他高大坚毅的背影，我们感悟到了：师当若山。







芮明杰老师：蝉联国家重点

文／刘海阳 吴兴宇　图／陈冬涛

2007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科获评国家重点学科。这是该学科继1988年、2001年两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之后，再次获此殊荣。

产业经济学科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产业经济学科带头人芮明杰老师，听他讲述蝉联国家重点学科背后的经验和故事。

记者：请您谈谈之前的复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科的大致情况。

芮明杰：产业经济学科原来由苏东水老师主持，早在1988年就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科在苏老师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国内也比较有影响。但是，从学科研究领域来看，虽然我们也做一些产业方面的研究，但一直和管理科学靠得比较接近，苏老师本人也一直在做东方管理的研究。甚至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也几乎和企业管理一样。

2001年，我们的产业经济学科参加国家重点学科评审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专评审专家提出了意见：第一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管理，而非产业经济主流；第二是师资队伍后继乏人，没有人能够跟上学科的发展。这两个批评是很正确的。

2003年，苏老师退休以后，学校和学院希望我来接手，实话说当时自己是不太愿意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从事的都是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企业管理界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最终还是接过来了。

记者：您接手产业经济学科以后，是怎样开展学科建设的？

芮明杰：接手以后，我意识到必须要解决专家所提出来的问题，并开始着手做三件事情：第一，要使我们的产业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符合国际主流方向；第二，在符合国际主流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出一流的成果；第三，我们要培养一支在国内有研究能力、有创新能力、有后劲的学科队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对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做了一定的改革，提高了产业经济中高级人才培养的水平。

在我开始接手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要怎么做，但是我认为一个学科要发展成国内一流，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针对当时产业经济学科出现的问题，至少要做以上那几个方面的工作，完成这个转型。

记者：产业经济学科具体的转型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芮明杰：首先是研究领域的成功转型。

2003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成立了产业经济系，让我有了一个改革的平台。我开始领导系里的老师做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我们复旦的产业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应该是什么？怎样才能让它在国内具有特色？怎样才能让它比较快地走入国际先进行列？我们经常开会讨论上面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确定以产业链的知识创新与产业链的规制为切入口来形成复旦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特点，抓住研究的前沿性。经过两三年的研究，事实证明，我们在国内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抓得很准，

学科的背后



而且有特色、有前沿性。我们在国内学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都得到了好评。我们后来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了批准。很多评论都认为我们的研究很具有先进性。

记者： 产业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哪些改革措施？

芮明杰： 2003年开始，我们对包括硕士和博士在内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做了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基本方案，是把原来偏向管理的体系完全转到以产业经济主流课程为核心的体系当中来。

与此同时，我们组织撰写产业经济研究生核心课程教材，一共八本，现在已经推出两本。我们也一直鼓励教师在教学上做一些改革。

记者： 经过几年的努力，去年年底重新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时候，和国内高校相比较，复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科有何优势？

芮明杰： 通过上面几项努力，去年重新评估国家重点学科的时候，我们有幸看到和过去相比，和其它学校相比，在很多指标上，我们都已经有很很大的进步。过去我们在重点学科里排名比较靠后，现在已经靠前了。当然，和最好的相比，我们也还存在差距，还要不断地改进。

记者： 产业经济学科如何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芮明杰： 以前复旦产业经济学科的教师，都不参加国内产业经济学科相关的学术团体，而我觉得，我们需要加入到国内学界的学术团体中去。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知名度，还可以得到一个发言的平台，同时可以观察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动态。

2003年11月，我就加入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担任副理事长一职，不断地在这个学会的年会上发表论文，发表对学界的看法，也因此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尊重、理解和赞赏。去年，我被选为常务理事长，并被推选为《中国工业经济》这本学术刊物的编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我将很多老师都推向了这个舞台，以此扩大我们在学界的影响力。现在，我们在国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下一步是要走向国际。

记者： 您刚才提到要“走出去”，以提升影响力，具体如何来看待，如何来实现？

芮明杰： 对的，“走出去”是很重要的。

我们学校的老师，包括管院的老师，不善与学界同人沟通，也不出去开会，基本上就躲在家里。在今天看来，这很不好，不利于和别人交流，也不利于把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大家，将来评



审的时候也会因此缺乏一些社会资源的支持。所以我们要经常走出去，和外界学者保持交流。虽然我们学院在这方面给与了很多的资金和物质的支持，但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用这笔钱，还是不太愿意出去，这个状况需要改变。

我是鼓励老师们到外面去的，尤其鼓励他们到国外去。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要求年轻老师到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去发表论文，这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先让他去小型的国际年会上初露锋芒，一步步来。如果有的人要求很高，要去就去顶级的国际会议，这可能吗？不太可能的。所以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要大家到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论文，但要从国内的会议开始，再到一般的国际会议，时间一长，提高了他们的兴趣，培养了他们的能力，自然会有所受益，慢慢地就往更高层次的国际会议上去了，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记者： 产业经济学科现有的师资队伍情况怎样？

芮明杰： 产业经济系老师不多。除了三四位教授之外，其他的都是年轻的老师。我们这批年轻老师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进入产业经济系的，都很优秀，竞争力很强，很多人还在做讲师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国家级的课题，很多人在顶级的学术刊物，甚至 SSCI 上发表了论文。

2006 年，产业经济系五个项目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得国家基金最多的系。今年我们还可以拿到两三个国家级的项目。12位老师，基本每个人都拿到了国家级、部级的项目。我们这支师资队伍，可以说后劲十足。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这三年多的努力，我们这批老师在国内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产业经济学科今后发展的基础。

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引进优秀的人才。虽然有这个计划，但我的态度是不着急，要看准，慢慢选。不是为了引进而引进，我们要引进的是真正有研究实力的人才。

整体而言，我们的师资队伍还在打造之中。

记者： 现在产业经济学科主要的研究团体有几个？

芮明杰： 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以郁义鸿教授、胡建绩教授和我领衔的三个研究团体，分别主攻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今天的研究更加要求合作性，所以团队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另外，学科建设是一个在长期的过程，学科带头人一定要组织起大家不断改进。即使评上国家重点学科以后，它还需要不断地跟踪、推进、交流和创新。

记者： 产业经济学科获评国家重点学科，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芮明杰： 在我看来，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有几个需要把握的东西：

第一，研究的内容要有先进性，要体现学术的前沿。

第二，研究的内容要体现特色，要有自己的方法、路径和理论支持。如果能够获得公认，那就是自己的优势所在。现在有很多学科找不准自己的特色。表面上我们都在做同一个学科，但是领域的概念很宽泛，具体在哪个方面做得特别有成就，不但要心里有数，还要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

学科的建设是需要组织和推动的，不能说任其自由发展就能把学科建设做好。自由发展也是可以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凝聚成几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我们人力有限、资源有限，所以需要组织起来，凝聚成几个有限的、有特色的方向，在这里面做出成绩来。把这几个方向做深做透，在国内乃至国际比较有影响力，学科的建设就算比较成功了。学科带头人应该起到领导、凝聚和组织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坚持不懈、长期努力。不能因为起步晚，觉得做不过人家，就不去做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赶上别人，也不可能有创新。重要的是先做起来，然后持续不断地做，坚持不懈地做。学科是靠积累的，时间长了，久而久之，总能够做好。

积累在平时，并不是等到要评审重点学科了，大家临时在申请表格上拼凑一些资料就好。这一点非常重要。

朱道立老师：物流事业的开拓者

“我们的目标是，用先进的管理理论、创新的管理思想和新兴的应用技术打造新时期的物流，广泛地服务社会，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朱道立老师



文／刘海阳 蔡 巧 图／陈冬涛

朱道立老师无疑是一个先行的智者。10年前，中国物流一片衰颓，教育部甚至调整了物流专业。即便如此，朱老师仍然凭着对中国经济的自信和热情开拓了物流在上海和复旦的沃土。如今，物流已经成为了上海的名片，各大企业的物流人才济济一堂，这对于他而言，是意料之事，也是期待之事。

开创一片天地

1993年，他受聘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交通运输研究所，主要从事交通科学的研究。在长期的研究中，朱老师深入实践，逐渐了解物流，并有了自己的思考。其后回国访问时亲历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物流将会大有作为。1997年，

他接受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郑绍濂教授的邀请，回国工作。回国后，摆在他眼前的是两个研究方向：一是交通与物流研究，二是金融工程。在两个方向上，他都有相当的研究基础。但他看到上海即将而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更需要高端的物流研究作支持，所以他最终把物流研究作为主攻的研究方向。

1998 年，中国的物流正处于低潮，教育部停办了物流专业，许多原有的国营流通企业纷纷转行，进行“多种经营”。在上海的一些大型外资企业已率先开始现代物流管理工作，但是很缺乏专门的物流人才，在企业里从事物流工作的很多是转行而来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感到，国家的发展需要物流的支持，社会的进步需要物流的人才。

于是，他开始在为着振兴物流而奔忙。他知道，物流人才的短缺是一大死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开设物流课程。“我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北方交通大学的一位教授很羡慕复旦大学能坚持做物流的教学和研究，因为他们学校的物流专业已经停办了。我说，不用担心，因为经济发展需要现代物流管理专业，恢复物流专业是必然的。”朱老师的勇气和坚毅可见一斑！1998年，朱老师开始招收物流方向的博士生，从事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同时开设了物流 MBA 课程。“上海第一批物流 MBA 毕业生就是我们复旦的学生。”除了培养专业人才外，科研力度的加强也是必要之举。朱老师申请到中国第一个物流管理方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他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与此同时，他与上海市商业委员会合作，在政府部门中推进物流的普及项目。另外，他将研究成果运用于企业实践中，为上汽集团、通用上海公司、和路雪等大企业做项目。终于在朱老师团队的努力下，复旦在没有交通、海运研究的基础上培养了一支物流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物流人才。同时，许多国内学者来复旦做访问学习，他们学成归去后都成为了当地院校物流专业的开拓者，“他们中有好几个都在后来成了物流系主任或物流研究中心主任。”朱老师很满意地说。也有来自法国、德国等外国学生来复旦学习物流，这对朱老师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在朱老师团队的努力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培养了一支物流教学和研究队伍，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物流人才。许多国内学者来访问学习，他们学成回去后都成为了当地院校物流专业的开拓者。

柳暗花明之后

中国物流业经历1998年、1999年的初步发展，在新的世纪开始焕发光彩：物流协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新芽迅速萌生，各大高校也顺势恢复了物流系，到2003年时已有几百余所高校开设了物流专业。此时的朱老师并没有松一口气，他知道自己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思考着，物流在全国范围内都兴起了，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我们的目标是，用先进的管理理论、创新的管理思想和新兴的应用技术打造新时期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广泛地与企业合作，服务社会，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朱老师和他的团队深入研究下，他们开发了一些重要现代物流应用技术，如配送技术、决策技术等等。他肯定地说：“可以这样说，我们开发的这些技术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他们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油品配送决策系统，有效地为他们减低了物流成本。为此，这个项目获得了商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运筹协会一等奖。另外，他们开发了创新的管理思想，为企业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比如融通仓，它是复旦大学的一个重

要创新管理成果。这种金融和物流集成管理技术能很好地解决供应链中的物流运输效率，提高和融资风险管理的问题。这方面上，我们与中国储运公司合作，为它创造了很好的效益。”据了解，中国储运公司融通仓业务（质押融资贷款）2005年为72亿元，去年的收益迅速上涨为150亿，估计今年能攀升到300亿，这体现了创新管理思想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在科研开发和运用的同时，朱老师为复旦大学培育了大量的物流人才。“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培养了三四百名高端物流人才，为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多年来，他将环境保护、安全管理与物流结合起来，建立了相关的研究队伍，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10月，朱老师荣获2006年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一等奖，同年11月，中国物流学会授予朱老师“首届中国有突出贡献的物流专家”称号。

新一轮的长征

从2006年起，朱老师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继续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帮助解决社会重大管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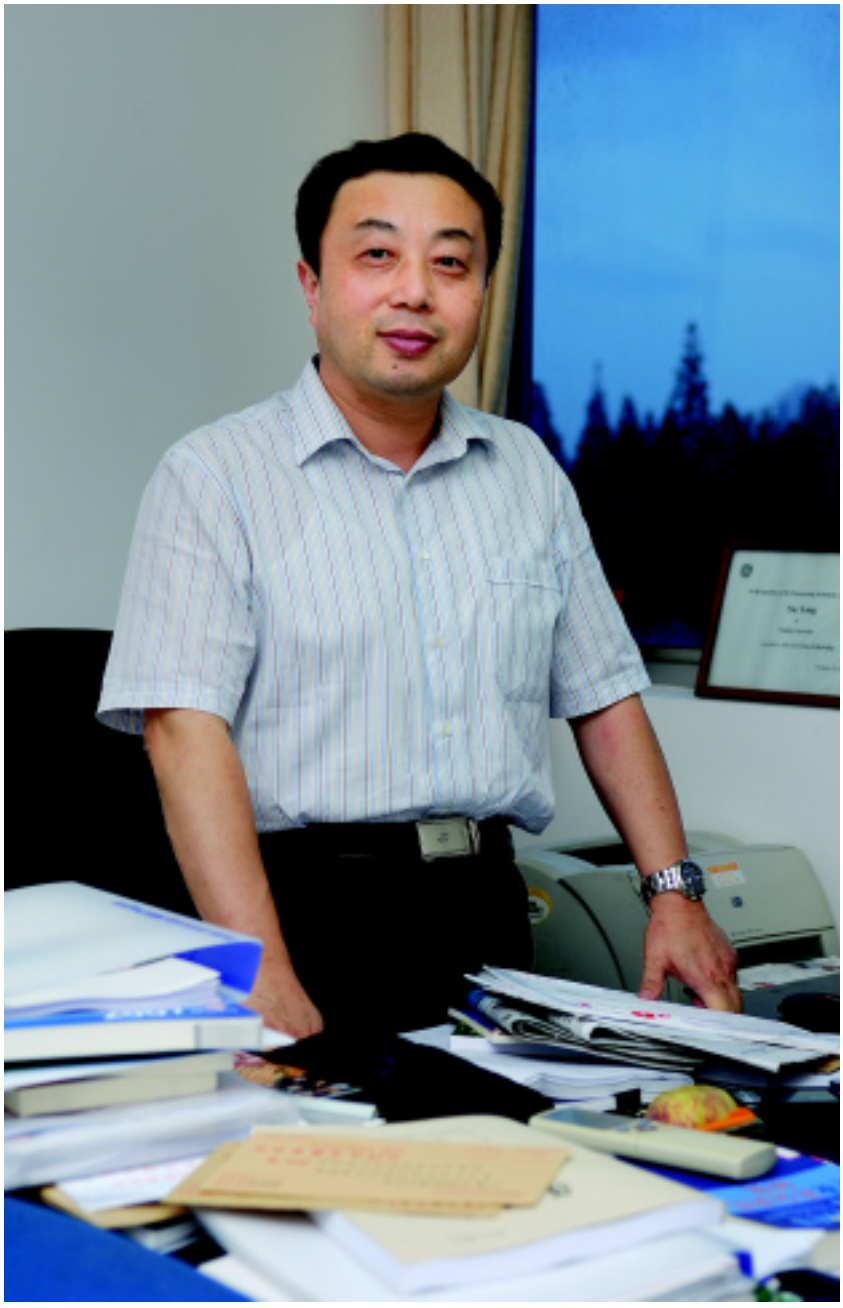
进入了新世纪的中国，政府的改革力度持续加强，经济调整已经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心。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开始凸现，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政府的工作需要各界人士的帮助和参与。朱老师认为，政企学结合来推动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这个思想得到上海市经委、生产安全管理局领导的认同和支持。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政府在物流管理的政企学全面合作是从制定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物流规划开始的。之后，他带领着团队和上海市政府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危险化学品和安全管理的研究项目。2006年以来，他们相继完成了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十一五”规划、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研究、上海市应对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策研究、上海市预防液氯、液氨及液化石油气等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的组织管理研究等项目。这些研究工作为上海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和公共安全事业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以后，我们要进一步和化学系、以及我院的统计系、信管系一起合作，将这个研究深入下去，尽最大可能为社会服务。”

在上海市政府和复旦大学的通力合作下，上海物流研究院落户复旦，朱老师任院长。“这是一个政、企、学结合的开放性研究平台。”他指出，在复旦大学多学科的交叉优势支持下，上海物流研究院能为解决国家和上海的重大经济社会管理问题提供支持，也将促进管理学科的发展。“我们的定位是创建政、企、学联合的开放性研究平台，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物流研究基地。我们的宗旨是坚持为我国和上海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苏勇老师：勤奋且高产的秘密

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八集系列电视片《晋商》，讲述了晋商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商业文化，和苏老师正在进行的管理文化研究关系密切，他于是很快买回了整套DVD碟片，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

文／吴兴宇　图／陈冬涛



八年工人经历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基本没有读什么书。”作为经历文革的一代人，苏勇老师自然没能逃脱那个特殊年代对他的影响。

1968年，13岁的苏老师正是学知识的年龄，但此后三年短暂而美好的初中时光却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游行、学习《毛主席语录》等各种各样的运动占据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基本没有读什么书。最后一年，先是到工厂学工半年，寒假之后，又在农场学农半年，然后就算是毕业了。

中学毕业之后，响应国家号召，很多初中毕业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大潮之中，走出城市，深入乡村。作为家中的独子，苏老师幸运地留在了上海，进入上海电力安装公司当了一名工人，这一待就是八年。从学徒到正式职工，年轻的他在实际工作中开始接触和思考企业管理问题。

1976年秋，苏老师被公司派往现在的新江湾城建设闸北发电厂，每天上下班都要坐车经过复旦大学校门。当时的复旦大学已经有经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看着佩戴着复旦大学校徽的大学生进进出出，他心里很是羡慕。就在这个时候，苏老师暗暗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也要到复旦大学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苏老

师参加高考并取得优异成绩。当年华东政法学院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次招生，正在寻找优秀生源，招生老师通过招生办了解到苏老师的信息，希望他能填报华东政法。但因为心里有一个复旦梦，他还是把复旦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并如愿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为一名复旦人。

痴迷企业文化

本科毕业之后，苏老师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因为敬仰朱维铮教授的学问，又着实喜欢中国文化史，他投在当时就以严厉而著称的朱维铮教授门下。1986年硕士毕业，苏老师婉言谢绝了市委宣传部等有关单位的工作邀请，选择留在历史系任教，一面教授《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等课程，一面担任学生工作辅导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企业文化”这样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曾经在企业工作过的苏老师马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主动了解和接触这一新兴理论，并开始自发地做一些相关研究。在一次企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苏老师认识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于先生充分肯定了他在会上的发言，并在会后找到他：“你的研究很不错，希望你能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很有前途。”1986年，苏老师出版了第一本企业文化方面的专著《企业文化——社会、价值、英雄、仪式》，于光远先生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体现了学术大师奖掖后学的风范。在这之后，苏老师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章，并成为国内最早研究企业文化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当时，著名学者苏东水教授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他很早就注意到了苏勇老师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在一些相关学术会议上认识并熟识以后，苏东水教授了解到苏勇老师有专业从事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研究的想法，便向管理学院提出申请，在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苏勇老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调到了管理学院。1991年，他在职考取苏东水教授的博士生，就读于工业经济专业。1994年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企业文化的系统研究》。

因为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加之苏东水教授的影响，在学术方面，苏勇老师主要研究组织行为学，偏重于管理文化、企业伦理、品牌文化等方面，和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教学课程也与这一方向密切相关，例如为博士生开设了《管理文化与企业竞争》、《东方管理学》、《品牌策略》等课程，为硕士生开设《组织行为学》、《管理伦理学》等课程。

他基本不看电视，仅偶尔看看新闻，更多时候是通过报纸、电台等了解时事资讯，因为他觉得看电视太浪费时间。

1995年初，苏勇老师出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项目副主任，同年底转为主任，这一做就是8年。接手的时候，复旦MBA招生规模仅为每年30余人，到2003年他离任时，已经达到每年480余人的规模。八年内MBA项目的发展，也是让苏勇老师颇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当然，这是在院长的领导下，经过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取得的成绩。”2001年，通过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竞争，“复旦大学MBA教学管理与创新”获得了这方面唯一的一个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谈及此事，苏勇老师没有掩饰他的那份自豪之情。作为当年的MBA主任，他自然为这份荣誉的获得付出了不一般的努力。

2003年，苏勇老师转任企业管理系主任。

著作论文高产

21年的从教生涯，苏勇老师出版著作20本（包括合著）、发表论文100多篇，并主持承担了很多科研项目，还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如担任上海生产力学会副会长，担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特邀嘉宾，在多个电视节目中就管理问题从专家视角发表看法。还担任上海机场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等。是什么原因使得苏老师如此“高产”？

苏老师自言：这大概主要归功于勤奋。他基本不看电视，仅偶尔看看新闻，更多时候是通过报纸、电台等了解时事资讯，因为他觉得看电视太浪费时间。“如果有一天看了两三个小时对学习无益的电视剧，我会有种愧疚

感。”苏老师笑着说道。

但是遇到特别好的、和自己的研究有关系的片子，则是例外。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八集系列电视片《晋商》，讲述了晋商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商业文化，和苏老师正在进行的管理文化研究关系密切，他于是很快买回了整套DVD碟片，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

《东京审判》也是一部苏老师很喜欢的片子。他说：“企业文化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但其实是由日本人首先实践的。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和日本的民族性很有关系。《东京审判》里面反映了很多日本民族性的问题。这和我研究的‘东方管理’很有关系。”

苏老师还提到了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作《菊与刀》，在这部文化人类学名著里，作者对日本文化和心理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只要加强外交攻势，迫使日本天皇投降，二战中的日本军队就会投降。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这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怎样解决问题的一个范例，当然，它解决的是宏观管理的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则是从文化角度来解决微观的企业管理问题，但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活中的苏老师每天起床很早，没有特殊的事情，他会一直待在办公室工作。甚至假期中也经常来学校。他不太进行娱乐活动，也不喜应酬。“一吃饭，两三个小时就浪费掉了。”所以除非很有必要的交际，一般应酬活动他都尽量推辞。学生有问题，他选择让他们来办公室谈。

苏老师认为，作为一个管理学研究者，除了要关注理论问题外，关注现实当中的问题同样也很重要。苏老师有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八年企业工作经历，加之对于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兴趣，苏老师很关注现实中每天发生的企业管理问题。最近苏老师就很关注中华老字号的问题，也很关注达能和娃哈哈的问题，专门针对它们撰写过一些文章，并接受了专访。企业当然喜欢这样非“纯学院派”的学者，更多对管理理论经过消化后的实际感悟和实务方面的经验，才能给企业带来实际的指导作用。所以也难怪学生们喜欢苏老师生动又深刻的教学方式，直呼“听苏老师的课很过瘾”了。

在苏老师看来，每个时代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并建立在前人的积累之上，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文化的积累。这和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可能有所不同。所谓的文化，是人类在和自然界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成果。苏老师说：“我们在研究企业管理的时候，既要研究其中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怎样提高生产技术，也要研究经济的东西。比如说资金运作等，但还有一点，这就是以前被忽视的，也是企业文化所赖以产生的基础，那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更要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整个企业管理的过程和方法，这也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在苏老师看来，西方管理学中的精髓，很多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述。

在苏老师的定义里，用中国传统的铜钱来形容企业管理再合适不过：“企业管理可以说是圆中有方：管理可能是圆的东西，要融会贯通，要巧妙运用，而文化可能是其中那个方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内核。”正是苏老师特殊的学术背景，让他能够用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企业管理的一些问题。

苏老师认为，目前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并没有落后于国际。组织行为学、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的研究，与国家、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在教学的时候，他发现引进的翻译教材里有关公司政治、价值观等章节根本就不能用，因为中外文化背景不一样，体制不一样，国情更是差异较大，这就造成了类似组织行为学、企业文化等国外教材和中国现实不相契合。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中国企业的话，那么研究管理文化和企业伦理等，中国学者无疑更有优势。

在苏老师看来，西方管理学中的精髓，很多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述。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民族企业实践的研究，也能发现它们很多成功之道与西方管理学是相契合的。比如说管理伦理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中国一句传统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夫子又说“不义之财，吾所不取也”，讲的就是应该追求怎样的物质财富，怎样去追求物质财富等，这和西方的管理伦理是同样道理，西方的管理伦理学，是将自然人推向法人，告诉企业在经营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获取利润。

郑明老师：恬静优雅的“统计人生”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尽力而为，做到自己最好的程度。我不会刻意去和别人比，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一直很平静地走下去。”——郑明老师

文／马晓楠 吴兴宇　图／陈冬涛

敲开李达三楼811室的门，我们见到了统计学系系主任郑明老师：清爽的短发、恬静的面容、一身优雅的黑色衣裙。正值暑假，郑老师还是每天都来办公室工作，不过比平时略微晚一点儿，早晨八点多到，下午五点多回家。教师这在他人眼里尤其值得羡慕的悠长假期，她过得和上班族没有太大区别。

“都已经习惯这样了。”郑老师微笑着表示。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洒在郑老师整洁的办公室里，弥漫着温馨的书香。

事业：从学生到教授

高三毕业的郑老师才16岁，还是一个比较懵懂的年龄。高中接触到的学科和大学的专业设置有很大的区别，她并没有特别考虑过想要报考哪个专业。填报志愿的时候，父亲跟她说，那就读统计学吧。那是文革以后首次招收数理统计专业的本科生。因为长期以来就特别钟爱数学，统计学和数学联系也算紧密，她就听从了父亲的安排。然而在父亲那里，选择这个专业还多了一层考虑：在当时那样一个人才紧缺、国家分配工作的年代，复旦统计学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应该可以分配到国家统计局、至少是省级统计局工作。他为女儿选择专业的时候，也为她设计好了一个大致的人生规划。

进入复旦大学统计学专业学习之后，经过慢慢了解，郑老师喜欢上这个学科。大学四年，除了体育课，其它的课程她都拿到了最好的成绩“A”，成为统计班成绩最好的学生。

大学毕业，郑老师并没有马上走上四年前父亲为她设计好的道路，而是选择直升研究生，留在学校继续读书。“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单纯，就觉得什么样的年龄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20周岁，觉得自己还应该继续读点书，学点东西。一旦工作了，这样单纯的学习新知识的时间就不会有了。当然，对这个专业我也挺喜欢的，就想要再多学一点。”这样一个选择，已经基本注定了郑老师会在统计学科的学术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在读研之前，我只是简单地照着老师的话去做，一个细节都不会偏差。”读大学本科的时候，郑老师是这样一幅乖学生的形象。读研期间，硕士生导师郑祖康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汪嘉冈教授给了郑明老师很大的影响，教给她怎样读书、怎样做人的道理。

郑祖康教授的教学方法比较特别，他不去管细节性的东西，只为学生引领了一个大的方向。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郑明老师真正地理解了统计学的含义和价值，体会到统计学对整个社会的意义。而对细节性东西的领悟，也让郑明老师不自觉地增强了对统计学的自主性，也对统计学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更加浓厚。

汪嘉冈教授是国内概率统计学专家，他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方式感染了正在学术道路上前进的郑明老师：“在做学问方面，苦练内功、不张扬的性格，我都是从汪老师这里学来的。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那里还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值得我去学习。”闲暇时候，汪老师会向学生阐述为人处事之道：“同行之间肯定有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应该是我扶你一把，你拉我一把，相互扶持，共同前进。” 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面，郑明老师能够淡然处之，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汪老师的教诲。

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郑老师继续在统计学科孜孜不倦地学习和钻研。开始带研究生后，她也用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自己和学生的关系：在学习上，她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不接受学生的任何“讨价还价”；在生活上，郑老师很关心学生，她跟学生

说，“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我”。因此学生们对郑明老师很是喜欢，但又有一点害怕，有一种敬畏心理。学生们毕业之后，还常常回来看望郑老师。大家聚会聊天的时候，学生们这才敢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讲给老师听：“郑老师，我们真觉得当您的学生挺有福气的。”讲到自己的学生，郑老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学生像朋友一样地随意聊天，这种感觉真的挺好。”

家庭：温情溢于言表

郑明老师现在担任统计学系系主任，平时要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要做课题，周末还有给MBA开设的课程，时间非常宝贵。但谈及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她表示：“家庭很重要。家庭处理不好的人，事业上也不会做得很成功。我只是觉得应该做的就去做。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要‘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问题。”

每天早晨五点多钟郑老师一家就会起床，先生做早饭，她洗、晒衣服，整理好房间。吃过早餐，送孩子上学，七点多钟即到办公室。傍晚回家，郑老师烧好饭，一家人一起吃饭聊天，先生负责洗碗。孩子很小就学会了自己洗澡，单独做作业，也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家务就这样很简单地、自然而然地分担开来了。

和先生相比，郑老师在教育孩子方面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她会在吃饭的时候和孩子随意聊天，了解孩子的想法，在不经意间将一些价值观、为人处事之道教给孩子。因为工作忙碌，郑老师不能长时间陪伴孩子。偶尔周末的时候先生出差，自己又要上课，她就把孩子送到一个亲戚家去，请他们帮忙照顾。但是她和孩子之间有个小小的承诺：黄金周期间，她和先生会抽空陪孩子玩一两天；春节期间，一家三口会到远一些的地方旅游。在孩子那里，这是一定会兑现的承诺。

孩子偶尔说起的那块卡通手表，妈妈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预订一个生日蛋糕，晚餐多烧一个菜，一句“今天是你生日，爸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还有一个爸爸、妈妈的拥抱，就让懂事的孩子欣喜万分。

受到妈妈的启发，孩子也开始用心地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每一次爸爸、妈妈过生日，他都会准备一份小礼物，配上一朵鲜花、一张亲手制作的贺卡，再唱一首《生日快乐》。这份小礼物，有可能只是一瓶十几块钱的黄酒——爸爸是绍兴人，爱喝黄酒，孩子细心地注意到了。“爸爸，让我们一起走过每一个快乐的日子。”这是孩子给爸爸的生日贺卡上写的一句话，让郑老师和先生一直甜在心头。

“这种言传身教、让孩子耳濡目染的教育方式会更加有效，我并不需要特别地为教育孩子花时间，稍微地用心一点，孩子就会很满足了。”体贴的丈夫、乖巧的孩子、幸福的家庭，无疑是郑老师事业成功的坚强后盾。

看到随行的摄影师的专业设备，







郑老师还问起他是否也拍写真集。她说："我想给儿子拍套好点的照片。"询问间，那种母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生活：爱美是女人天性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郑老师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工作忙碌的她采取的可不是长时间逛街享受购物乐趣的方式。平时短暂的闲暇时间里，她也会翻看一些时尚杂志和画报，看中了衣服的款式，就直奔目标买下来。先生和孩子的衣服，也多半由郑老师来购买。她还尝试过网上购衣这种时髦的方式。花很少的时间，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郑老师这一身优雅的黑色衣裙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一次参加一个统计学系主任会议，在场的几十名系主任中，只有郑老师一位女性。其实管理科学的大环境中，女性本身所占比重就很小，在专门和数字打交道的统计学科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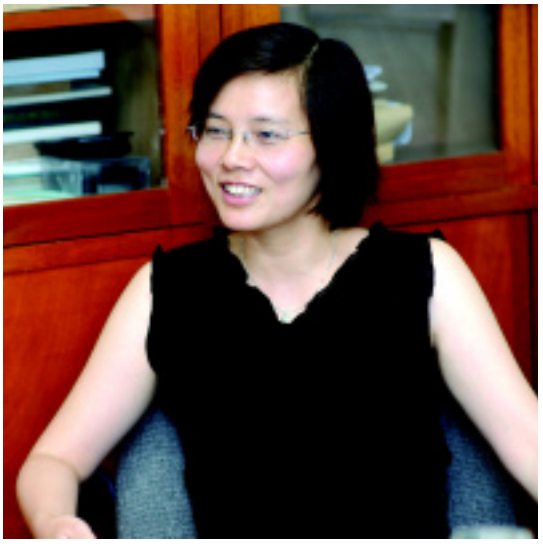
"其实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有很多女性这样想：'我是个女的，我做到差不多就好了。'所以才会真的就只做到那种程度。客观上，我认为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多大区别：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心态去做，付出同样多的努力，结果肯定不会有很大的区别。"郑老师认为，男女差异并没有大家普遍传说的那样大，是不同的主观因素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尽力而为，做到自己最好的程度。我不会刻意去和别人比，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一直很平静地走下去。"

"'诚诚恳恳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其它的都不重要了。"阳光下的郑老师一脸恬淡的微笑。









"家庭很重要。家庭处理不好的人，事业上也不会做得很成功。""我只是觉得应该做的就去做。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要'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问题。"

单纯的“问题男生”张诚老师

他回忆道，讲课远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不想只照着书讲讲，想要讲得稍微好一点点的话，就要付出很多。开始时，小张老师总是先回忆哪些内容会吸引自己，然后再把这些内容拿到课堂上；还不断思考自己的授课和别的老师的课有什么不一样，并慢慢的在教学过程中总结，逐渐有了感悟。

文／郭 静　图／陈冬涛

一如名字，虽然已经教了三年书，年轻的张诚老师仍然有着真诚的单纯，与略带学生味儿的理想化。

单纯，是因为小张老师爱从简单的方面考虑问题，就像当老师，他喜欢读书，读完本科研究生一直到拿了博士学位，然后就找学校做一名老师了，全部过程理所当然，很简单，没有什么选择困惑，甚至也无需太多解释。小张老师的求学之路的确很顺利，2000年他在复旦管理学院读完本科，经院里推荐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硕博连读。博士毕业后，小张老师的夫人给了他两个选择：新加坡或是上海。当年11月，小张老师回到了复旦。

小张老师是天生的书虫，他一直觉得书中有很多乐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时他总是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论文，发现其中有道理的新观点，就会觉得很有趣。他做研究也总是从自己觉得想要知道的东西入手，这样更加有趣，比如网络的社会性问题，博客问题等等，他认为有精力去探索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这本身也是个很大的满足的过程。

不过，从好学生到好老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谈起这个转变过程，小张老师微笑地说，至今为止就两个感觉：一是自己真的好单纯，二是碰到了一个好机会。他回忆道，讲课远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不想只照着书讲讲，想要讲得稍微好一点点的话，就要付出很多。开始时，小张老师总是先回忆哪些内容会吸引自己，然后再把这些内容拿到课堂上；还不断思考自己的授课和别的老师的课有什么不一样，并慢慢的在教学过程中总结，逐渐有了感悟。比如他发现PPT的问题在于会给人心理暗示：答案会在下一页，不利于激发学生思考。因此，他在上课开始减少使用PPT，而更多改用写黑板的方式。将讲课内容更多的和管理实践相结合，包括商业案例、新闻报道，个人的经历和人生感悟，并更注重和学生的互动。这种参与式的授课方式增加了备课的难度，因为一个问题要去讲什么、有哪些可能答案、如何产生解决思路、学生可能有哪些想法，这些都要求老师要提前想过。而为了激发学生思考，设计的问题间都要具有逻辑，并最终引导学生自己找到解决思路。因此，设计的问题和思路都要在课前写成教案并备下来，以便在课堂展开。小张老师介绍，起初一小时的课要备六个小时，一天的课则要备一个星期，准备全英文的一个案例需要完整的半天。对他这种讲台风格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是1999年台湾来复旦的访问学者郭宏志。小张老师当年修了郭老师一个学期的课，他深情地回忆说，郭老师讲得非常有趣，总是掺进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而不是只平平地讲书本内容。当然回来教书后，小张老师也去听其他老师的课，或是通过课程录像观摩。现在他也仍处于一个

小张老师介绍，起初一小时的课要备六个小时，一天的课则要备一个星期。

学习的过程。

很明显，张诚老师是个理想化的学者，他很爱研究各种有趣的问题，并且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着完美的设想和期待，同时也对自己三年来的研究进展很不满意，觉得慢了很多。谈到工作信念，小张老师觉得在新国大的求学过程中获益颇深。一个是 adapt to reality，就是适应现实、谋求生存的问题。诚然，国内仍有不少不足，但和国外有差距并不是做不好事情的理由。另一个就是 struggle for survival，保持有危机感就可以做得更好。

说到休闲活动，小张老师曾经也很迷恋电脑游戏，但现在慢慢地乐趣少了，游戏已经不能吸引自己。但他喜欢打桥牌，上学时和同学在一起玩，很开心，这也是一种联络方式。他最喜欢的还是要数在晚上看看小说了。对小张老师来说，工作和生活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工作就是生活。他就是这样，对研究充满了无限热情。他承认对自己而言，尽管在教学能获得不少乐趣，比如有毕业的学生第二年发来贺卡问候、有学生在毕业前夕写来 email 表达感谢，但他个人的更大乐趣在研究上，在思考和解释各种有趣的问题上，他在枯燥的研究里享受着乐趣。"天知道呢，我终究是个问题男生"，小张老师笑眯眯地说。







天生乐天派裘理瑾老师

“我呆在管理学院这么多年，参加了许多的项目，和许多的老师一起努力，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成为了一家人。我的老师们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关心着我，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裘理瑾老师

文／蔡　巧　图／陈冬涛

采访裘理瑾老师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肆无忌惮地洒到了办公室里，她对着我们一笑，便开始在我们的问题中侃侃而谈。



一次意外的转折

“我是个老复旦人，也是个老管院人！”她无不自豪地说。1993年，裘理瑾老师考入复旦大学会计系，之后直研、直博，11年的光阴都是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里面度过的。2004年末，裘理瑾老师博士毕业，第二年初被聘为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讲师。于是，记者奇怪了，为何会计科班出身的她会成为营销系的老师？针对记者的疑问，她说：“我一直很喜欢会计这门学问，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到了营销学的魅力。”那是在1999年，复旦大学与中国奥委会合作了一个体育产业的MBA项目，她非常幸运地被推荐为讲学教授远赴美国接受培训，而那时的她还只是个研究生。她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非常喜欢体育，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同时我的英语比较好，所以我得到了这个宝贵的经历，这也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促使了我转换研究方向的决心。”

同时，裘理瑾老师还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在她看来，会计已经花费了

她许多心力和时间，贸然放弃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会计学本身的热爱，还有对她的导师——李若山教授的尊重。说起李教授，她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从读硕士开始就一直跟着李老师，他在学术上的权威、在治学上的严谨以及对学生的关怀为她树立前进的目标。所以，裘理瑾老师在攻读会计博士学位时，还要腾出心力作营销学的研究，终于在拿到会计学的博士证书的时候，还有一张营销系的聘书。

并不剧烈的突变

2005年，裘理瑾突然从“裘同学”变成了“裘老师”，这样的突变对她而言似乎是水到渠成，并不激烈。

按理说，拥有着会计学的博士学位和丰富营销学知识的她大可以到大企业里面去打拼自己的一片天空，裘理瑾老师却选择了学校。她说：“我呆在管理学院这么多年，参加了许多的项目，和许多的老师一起努力，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成为了一家人。我的老师们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关心着我，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从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开始决定要留在学校里，留在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所以，虽然我现在是管理学院的老师，可很多老师都还爱叫我的小名，而不称我为‘裘老师’。”而在此之前，裘理瑾老师已经在管理学院上了很多年课了，早在她从美国培训回来时，学院的领导就开始鼓励她为MBA学生开课。

说到心态上的转变，裘理瑾老师坦言自己有过一段波澜。虽说以前也为学生开课，但那还不是生活的绝对主题和必须义务，可是当她成为裘老师后，沉重的责任和压力就落到了她的肩上。与此同时，她还遇到了另外的难题：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教学任务？每天都排得满满的课程，占据了许多时间，从而学术研究就显得局促了。不过，裘理瑾老师天生是个乐天派，遇到烦恼了就暂时先抛到一边，做会儿运动，逗会儿小孩子，心情就又开朗起来。随着教学和研究的逐渐深入，她开始发现：教学的过程也是思考科研的过程，学术上的许多火花都来源于教学，尤其是在给MBA上课的过程中，她的学生常常会教给她许多新的知识。

无数成长的惊喜

“成长在管理学院，对于我而言，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她如是说。的确，管理学院给了她太多的机会和惊喜。

2001年，在奥委会与复旦大学合作体育MBA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是博士生的裘理瑾被项目组的领导陆雄文老师和孙一民老师推到了前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站到闪烁着镁光灯的台上，我看到了许多期待的目光，还看到了陆老师和孙老师鼓励的笑容，当时我的脚都在发抖。”不过，这次“处女秀”却相当成功，所有人都夸她目光沉着，合作伙伴还拍着她的肩膀说这个“小孩”真不容易。而从此以后，她再也不畏惧站上各种各样的舞台。

在此之前，管理学院还给了她一个珍贵的机会——为MBA学生开课。这对于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她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机会，也是一个天大的压力。面对具有全球化背景的学生和全英文的MBA课程，年轻的她还真有些怕了，但最终她在学院领导和老师的鼓励下开了体育营销的课程。

而教学，对于她而言，又是另一种惊喜。她说，新成长的年轻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和八十年代的学生打成一片。“有的学生在写EMAIL给我的时候，称呼不用‘裘老师’，而是称‘EMMA姐姐’，有的同学还和我在MSN上聊天。与他们的交流不再局限于课堂上的一两个小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仅是师生关系，这让我感到很幸福！”

她说，自己在管院的日子不短，可在管院的庇护下，成长的旅程也算一帆风顺。“陆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给了我许多的机会，没有他们的帮助，也没有我的今天！”她很是感激。不过，她也在自我反省。她提到，自己的性格比较淡定，不喜欢很激进地追求目标，只希望可以脚踏实地地做学问。“我还是不够积极啊！”

“平时的我只是个很普通的fashion girl，所有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情我都喜欢做。有空的时候，我会去做运动、逛街、拍写真和旅游。同时，我还很喜欢和我们家小孩儿一起玩，感觉这也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她是这样讲述的。

如今，裘理瑾成为了2008奥运火炬手华东区的候选人，等待她的是更加精彩的明天。

“平时的我只是个很普通的fashion girl，所有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情我都喜欢做。有空的时候，我会去做运动、逛街、拍写真和旅游。”

陆亚东教授，且行且大成

“较好的学者是看日历，按照年、月、周、天来计算时间与产出的，而更优秀的学者是看钟的，按每天、每小时来要求与衡量产出的。我平时教学任务很重，所以我不在办公室放椅子，我希望来找我的学生可以有事讲事，不用坐在椅子上浪费时间。”
——美国迈阿密大学商学院杰出终身华人教授陆亚东

文／刘海阳 蔡 巧 图／陈冬涛

一位华人教授，用10年多的时间，写出15本英文原著，在国际主流刊物上发表100多篇论文，在Google－Scholar上的索引超过1500次。这就是美国迈阿密大学商学院管理系系主任、杰出终身教授、Emery Findley杰出讲席教授陆亚东（Yadong Luo）博士。2007年7月底，陆教授回国访问交流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短暂的采访，分享了他的治学理念与心得，他那严谨认真、潜心探索、心系实践、虚心大度的治学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象。

记者：您在去美国留学以前、留学期间的经历是怎样的？

陆亚东：1985年，我辞去江苏省外贸局的工作，去北京外贸学院读国际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三年研究生的经历培养了我最早期的研究爱好。1988年，也就是研究生快要毕业的那一年，当时的《国际贸易》杂志全年发表我有关国际企业财务管理的12期连载文章。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回到江苏省外经贸委直至1992年去美国费城Temple大学攻读国际商务与战略博士学位。三年后我完成博士学位并即受聘于夏威夷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两年后从助理教授转为副教授。2000年受聘于迈阿密大学正教授、讲席教授至今。

记者：您的研究方向、范围有哪些？

陆亚东：我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国际会计与国际企业财务管理，后转至跨国投资、战略联盟、战略管理和跨国公司管理，近几年又增至新兴市场战略与管理、全球战略设计、国际企业公司治理、全球业务流程分包、新型跨国企业的发展战略等。

记者：那您在多年的治学上有着怎样的体会？

陆亚东：好的学者应当是一个SWOTER，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S就是SCIENTIST，即要求我们要有科学家的素质，需要有领先的专业技能、高尚的人格与职业道德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W就是WRITER，即我们需要做精作者。写作是无底的，要写出好的文章必须不断积累，要试图用较少的字、词表达最深刻、清晰的句子，这就是精作者的要求。我平时总是带着一个本子，看到有好的字词句就记下来，这对于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O即是OBSERVER，即洞察者。不同于其他学科，工商管理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相联系并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因此，好的商学学者应当善于洞察，要研究新的现象以及其背后的深意，而这些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们的学者应当走出办公室，到企业去，到实践中去做学问。T就是THINKER，我



们应当是个深思者或思透者，这是衡量学者的一个重要指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并非人人都可以思透。学者的研究要得到世界主流的认可，必须要有深刻的理论深度和原创能力，而这就需要多思、思透。

记者：在您做学问时有着怎样的原则或者标准？

陆亚东：第一个原则就是心精而形简，我们的心是无底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索，所以我们要集中自己的心力去琢磨精华的事情，而外表的、浮华的、人云亦云的东西就不要过于介怀。

第二，心静而熟思。如今这个社会，诱惑很多，想安心地做学术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抵抗诱惑，静心地思考、探索、写作。但有些机会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杂志的工作，我自己就在三个杂志担任编辑。在作分析或写作的时候，我也常常遇到瓶颈，心烦意乱，此时我就会停下工作，在房间里面踱步，去湖边散步或去游泳，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我很多的思路都是在水里面被整理清晰的。

学问就是宇宙，做得越多，会发现宇宙越大。所以，我们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不能把自己的理论思想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第三，心宽而纳宇，做学术难免遇到困难，此时必须心宽。近年来，Top主流杂志的接受率越来越低（约5%），理论与方法要求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长。当论文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常会心跳加速。但成熟的研究者既不要因为文章被接受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文章被拒绝而气馁。同时，学问就是宇宙，做得越多，会发现宇宙越大。所以，我们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不能把自己的理论思想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最后，心智而索优。管理学的结论往往是多元的，战略研究的结论更是开放的。例如，中国企业国际化应当走怎样的道路？是欧美道路，日韩道路，

还是自我独特的道路？这就要求学者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最佳战略。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通过多学、多读、多思，从众多理论或方案中找到最优答案。

记者：那您在学术上又有怎样的目标？

陆亚东：学术目标既要高远又要现实，在心中寻榜样。我博士毕业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领域内的最前沿学者索要他们的简历。当看到他们每人十几页、二十多页的文章清单时，我一夜都睡不着，当下就为自己定下了目标：10，100，1000，即是拥有10本英文原著，拥有100篇发表在国际主流刊物上的文章，同时自己的著作或文章在GOOGLE上的索引超过1000次。如今，我的目标是尽量超越以前的自我，并尽力为年轻学者多作指导，为学术领域多作服务。

记者：您在治学路上遇到过何种困难？

陆亚东：恐怕就是如何平衡教学和研究，平衡服务与研究的问题了，我想这是商学院所有老师都面临的难题。我平时要教学，杂志编辑和系主任的日常事务越发繁重。所以我对时间进行了这样的安排：60%用于研究，20%用于教学，20%用于编辑和系主任工作。我所供职的迈阿密大学是私立大学，教学要求与压力很高很大。平时，我尽量布置避免学生来办公室的作业，要让学生知道我在乎他们，但又要防止自己的工作受到干扰。

记者：听说您的时间观念十分有趣，能具体说说吗？

陆亚东：我认为，较好的学者是看日历，按照年、月、周、天来计算时间与产出的，而更优秀的学者是看钟的，按每天、每小时来要求与衡量产出的。我平时教学任务很重，所以办公室的门永远为学生大开，但是我不在办公室放椅子，我希望来找我的学生可以有事讲事，不用坐在椅子上浪费时间，从而达到在善待学生和科学利用时间上的平衡。另外，我每天会收到近百封电子邮件，我会在吃饭或下班前集中处理这些邮件。此外，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对他们都很客气、尊重，但我从不参加他们的各类社交聚会。

> “我每天会收到近百封电子邮件，我会在吃饭或下班前集中处理这些邮件。”

记者：您刚才说做学者会受到各方面的诱惑，比如说呢？

陆亚东：这些诱惑也可以说是机会，我们必须承认，机会是重要的。但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先做好学问，不能为了机会而做学问。学问做好了，机会有时会跟上，学问没做好而去钻营机会，那就成了机会主义者。从我的第一份工作（夏威夷大学）到受聘讲席教授至现在的系主任职务都是他人先提供给我而非主动寻求的。诚然，机会并不均等，但机会面前的成功者大多是事前沉潜准备，事中审慎掌握，事后总结得失的人。学问之路太长、太深、太广，机会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



过去的教授

文／谢　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直以来，大学教授都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过去的教授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楷模。在过去艰难的年代里，大学教授从没有停止过为社会正义鼓与呼。

对今天的人来说，那个年代已成历史。我们只能回望，从前辈学人留下的点滴文字中，感受那个年代的教授风貌。

自由流动的教授

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自由流动也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教授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杨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廿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

像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

说痛快话的教授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称“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

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奚若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

时，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讲课自由的教授

讲课自由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讲课自由，是指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有自由传播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也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旧大学里对前一点体现得较好，而对后一点限制颇多。

旧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就是在课程设计上留给教授很大的空间，简单说就是那时没有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就是由讲义而来的，有些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多年以后出版，人们也会当作学术成果看，这是旧大学里的一种传统。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会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

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

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自由授课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很受推崇的。

年轻潇洒的教授

可能与当时评聘教授的制度有关，过去的教授都很年轻，这一点在西南联大身上就可以印证。当年西南联大教授的五个院长中，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最年轻，四十岁；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最大，四十八岁。各系系主任也都是三四十岁的少壮学者，其中算学、电机、航空、化工等五系主任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化工系主任谢明山只有三十二岁。

当时已经有名气的教授如朱自清、曾昭抡、钱端升、雷海宗、罗常培、闻一多、周培源等都在四十五岁以下，吴晗、钱锺书、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等不到三十岁。当时西南联大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助教人数比正副教授的人数还多（当时助教211人，正副教授186人，见《西南联大的研究》，台湾杨正凯博士论文第84页）。而这些助教中，很多都是正在联大研究部功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具有相当整齐的水平，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知名的学者，如牛满江、何炳棣、任继愈、杨志玖、殷海光等等。大学的活力来自青年，除了学生，应当还包括她的教授队伍的年轻化，过去二十多岁当教授并不是一件希罕事。

教授保护学生

在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平时也许并不那么亲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则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对学生也可以说是爱生如子。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教授一般是有一个态度的，有时教授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听他们的话。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时候，也有和学生起冲突的时候，但教授和学生彼此之间的信任，一到关键时刻，便会体现出来。

冯友兰回忆录中，就表达了他很珍惜当年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

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

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

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

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学生挑战权威

当年，傅斯年还在北大读书，想办一个刊物，就去和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就这样办起来了。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写文章批评了当时北大文科的教授马叙伦。

当时北京大学出版部刚出版了马叙伦的《庄子札记》，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辩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并指出马叙伦抄袭了胡适的观点。

傅斯年说：“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紧接这篇文章之后，还是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评文字，这回是批评蒋维乔译的一本书《伦理学讲义》。

傅斯年说蒋维乔译的这本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文章对错另当别论，那生气，那挑战性，那种追求真理的勇气，今天想来还让人感慨不已，当年《新潮》社出了那么多人物，与那样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校长保护教授

大学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对旧大学的校长来说，他们决策什么事情，往往先会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进行沟通，全然不把大学校长当做一个官员来做。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

那时的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凡是教授和学生遇到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把教授和学生放在第一位，这是过去做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

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谁都知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些进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说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直至最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三位教授。

史学家张芝联回忆，他当年在上海光华教书时，有一段时间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 年 3 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

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校长。朱经农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

校风的熏育与传承

史学家李埏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对联大的学风非常怀念。他说那里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比较少的。这个大学，像不择细流的湖海一样，把许多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内，可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但在那个领域之外，还有很多领域，很多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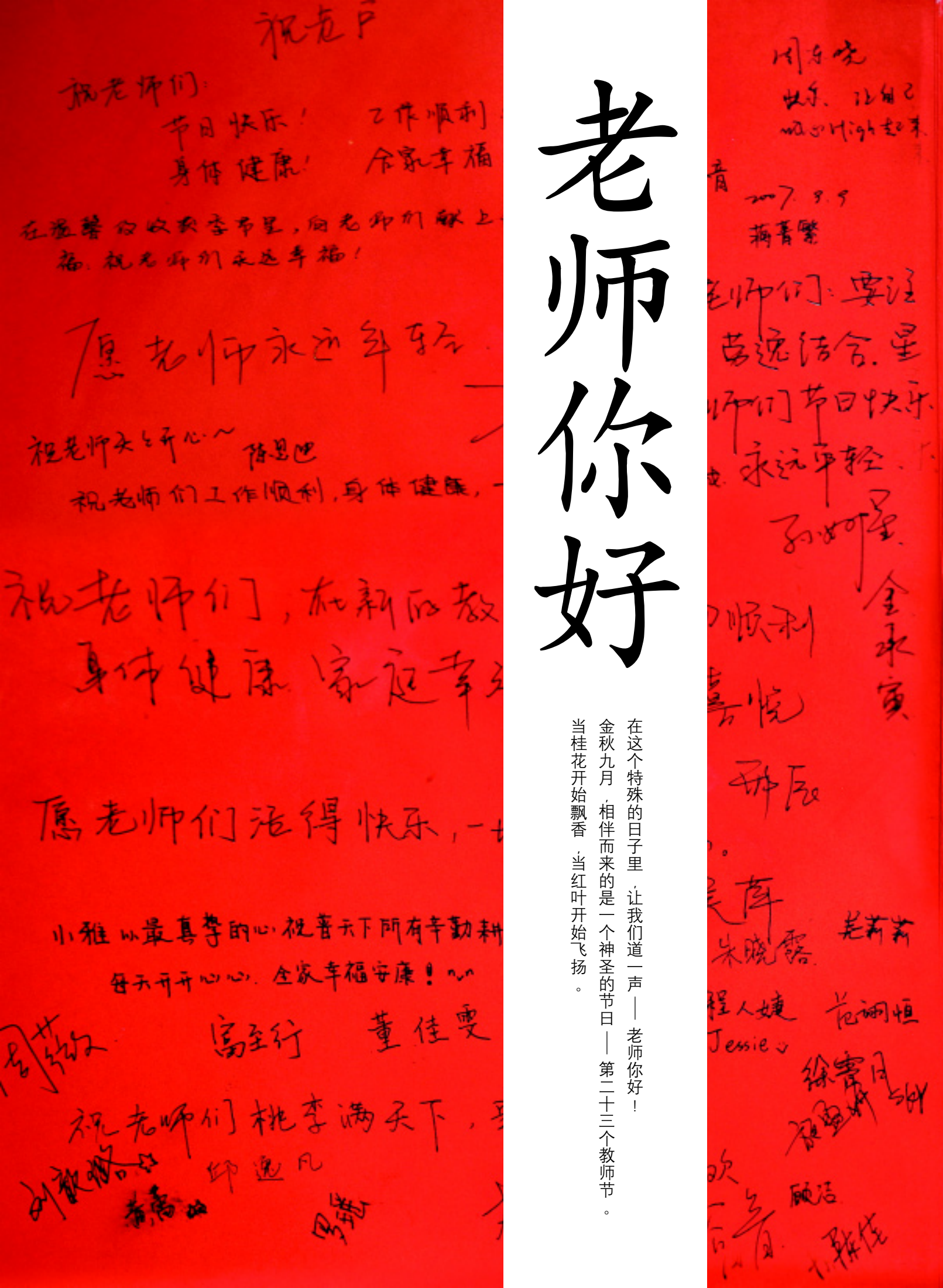
李埏说他在联大时，常常听到一些他很心服的老师谦逊地说，自己对某方面所知甚少，某个问题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这种态度对他有很深的教育。他还经常看到已经颇负盛名的教授，到其他教授的讲堂里，和学生们同坐在下面一同听课。

王浩把他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姜亮夫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时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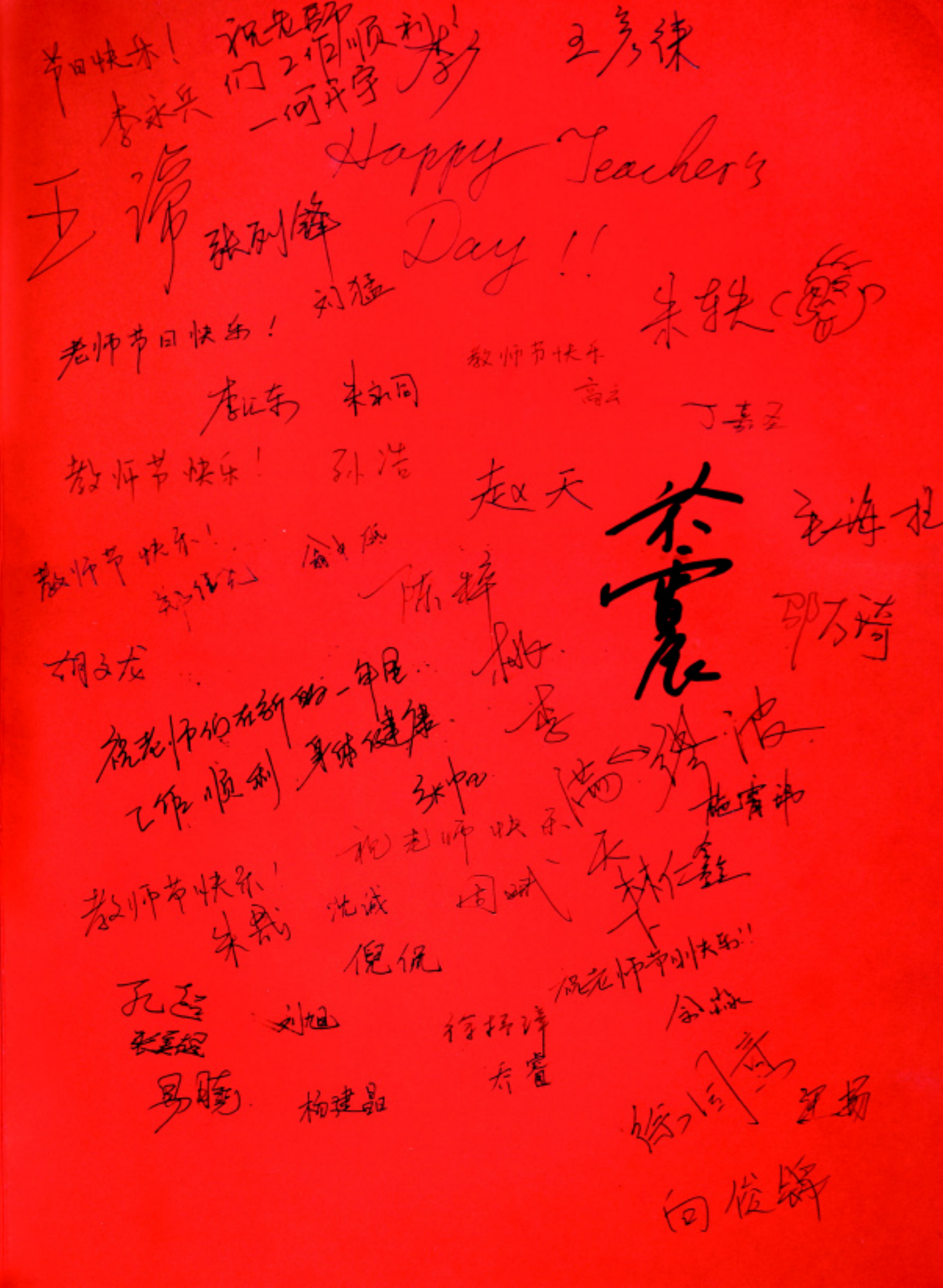
殷海光 1938 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赏识。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待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而当下，内地（大陆）这样有影响的学术传人谁人堪当呢？

（本文为 8 月 1 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



老师你好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道一声——老师你好！
金秋九月，相伴而来的是一个神圣的节日——第二十三个教师节。
当桂花开始飘香，当红叶开始飞扬。


节日快乐！
祝老师们工作顺利！
李永乐
一何年字
多练
王冲
Happy Teacher's
张利锋
Day!!
刘猛
朱轶(警)
老师节日快乐！
教师节快乐
高云
丁嘉圣
唐仁东
宋永同
教师节快乐！
孙浩
赵天
祭
毛海北
教师节快乐！
余文欣
陈辉
邵方琦
胡文龙
祝老师们在新的一年里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陆猪浩
杨清渊
祝老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
宋
沈诚
周啊
倪侃
祝老师节日快乐！
余淼
孔适
刘旭
张嘉超
易鹏
杨建昌
行行清
东霞
向俊锋